

(AEP) 103

前 言

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朝阳区楼梓庄人民公社楼梓庄大队广大贫农、下中农和中农社员，在公社党委和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多数社员不仅回忆了解放前在经济上受到的剥削压榨，而且也控诉了三大敌人在政治上压迫欺凌农民的罪行；不仅回忆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过去的罪恶，而且也揭发了他们现在的反对社会主义、破坏集体经济的阴谋复辟的活动；不仅回忆对比了过去和现在个人的苦乐，而且通过群众的自我分析提高，把个人的、零散的、一家一户的苦提高到阶级的苦，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通过这次阶级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政治积极性、革命警惕性、劳动创造性、工作责任心以及阶级友爱和共产主义风格等等，都有了很大加强。从而使他们更加憎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更加干劲冲天地创建新生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证明，忆苦思甜，回忆对比，大诉旧社会阶级压迫之苦，是群众运用自身的经历，进行自我教育，提高阶级觉悟的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它不仅是对青年一代革命接班人进行阶级教育的有力武器，而且是中年人、老年人永远

不忘过去、启发阶级觉悟，自觉地把阶级压迫苦、阶级仇恨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好办法。

在诉苦过程中，楼梓庄广大贫农、下中农社员群众，热切希望能够把本庄贫农、下中农的血泪史和地主阶级的罪恶史记载下来，保留下来，作为今后广大社员群众忆苦思甜和对青年一代进行经常性的阶级教育的教材，使楼梓庄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子孙万代永远不忘阶级仇恨，把贫农的“家谱”一代一代传下去。

为此，我们组织了全村的共青团员和贫农、下中农的青年，利用访问老雇农、老贫农和开展家庭诉苦会等形式，广泛地搜集了村史、家史的素材，编写组同志在这个基础上结合运动做了整理。写出初稿后，又交全村贫农、下中农社员广泛讨论、补充；经过群众反复几次补充，修改，才定下稿来。因此，这本书是群众集体搜集材料、集体讨论、集体补充修改、集体定稿的创作。

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和编写者水平所限，本书一定会有不少不妥之处，热望读者指正。

編 者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于楼梓庄

封面設計：侯叔彥

統一書號：10071·714

定 價：(5) 0.34 元

目 录

村 史

貧农“家譜”万代傳.....	1
——樓梓庄貧农、下中农血泪史	
階級仇恨永不忘.....	20
——樓梓庄地主階級罪惡史	
[附] 大事記	
日寇在樓梓庄的一次暴行.....	40
地主武装罪行录.....	45
樓梓庄文化教育今昔.....	53

家 史

三代长工苦难熬.....	57
——长工赵文財一家三輩的遭遇	
仇恨的烙印.....	67
——一个貧农家庭的血泪史	
苦根儿.....	81
——小鉄梁流浪記	
半斤杏子.....	95
——貧农沈永珍的一段家史	

受尽欺压的苦日子.....	102
——記貧农李清的回亿	
破庙一家人.....	108
——記貧农王秀荣的回亿	
苦难的童年.....	115
——貧农郭瑞、何淑英的家史	

貧农“家譜”万代傳

——樓梓庄貧农、下中农血泪史

樓梓庄座落在北京东郊离朝阳門三十多里的地方。村东北有濫榆河一边繞过，村南有小壩河橫貫流去，村里树丛中散布着五百多戶人家，村外是一馬平川的沃野。

这是个富饒的村落，村东和村南的低洼地，适于种植玉米、小麦、大豆、高粱等粮食作物，一年可以两熟；村西和村北的高崗地，土质肥，盛产棉花、芝麻、大葱等經濟作物。

解放后，随着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各项运动的展开，樓梓庄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壩河在解放前是一条又窄又淺的臭水沟，現在修得又寬又深，水流常年不断；河两岸筑起了高高的堤坝，河里修起了高大的閘門，閘門两头建造了两座揚水站；电閘一开，水就順着纵横交錯的水渠流去，澆灌着几千亩良田。解放前，村里許多人家里連煤油灯都点不起，現在村里架起了高压綫，不仅灌溉土地，粮食加工等也用上了电力，多数社員戶照明也用上了电灯，有很多社員还装上了收音机。解放前，只有地主家才使得起的又笨又重的鉄皮畜力車，現在差不多已經絕迹，換上

了輕便、載重量大的膠皮輪大車。机耕面积正在逐年扩大，每亩土地化肥施用量也在逐年增加。一九六二年单位面积产量由解放初期一百六十斤左右增加到二百九十三斤。尽管土地总亩数由于外調、工业占地和兴修水利等，比解放前少了三分之一多（三千多亩），但是一九六二年粮食总产量为一百六十六万八千多斤，仍比解放初期的一百六十万斤略有增加。

随着生产的增长，社員不仅物质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文化水平也有了迅速的提高。现在全村共有高小、初中、高中毕业的知識青年三百多名，有二十九名农民的女儿上了大学。而解放前从一九一六年本村建立小学到解放前夕，三十多年間，全村没有一个念高中的，只有两个人在通县县城念过初中。

俗話說：“飽嘗黃連知蜜甜”。今天的生活越是幸福，楼梓庄的农民越是不能忘記过去在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底下的悲惨、屈辱的貧苦生活。楼梓庄的农民們在党的教育下，深深地懂得怎样珍視现在，热爱未来，創造未来，但尤其是懂得不能忘記过去，不仅这一輩不能忘記，而且还要教育子子孙孙永远記住过去，从而永远不忘階級和階級斗争，永远艰苦奋斗，努力締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此，楼梓庄的广大貧农、下中农社員开会一致決議，把楼梓庄过去的历史，把貧农、下中农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血泪史，把地主階級剝削、欺榨农民的罪惡史，記載下来，作为今后重溫过去的历史、进行階級教育的教材，永

世保留下来，流傳下去。

現在，就讓我們隨着老一輩樓梓庄人回憶的腳步，回溯十五年以前的樓梓庄，看看那時勞動人民所遭受的種種壓迫和深重苦難。

兩家貧農不幸的遭遇

常言道，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民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一切。解放前樓梓庄九千畝土地被地主富農霸占了七千多畝，而占全村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貧農、下中農每人平均不到一畝地。其中有占總戶數百分之十三強（六十九戶）的赤貧戶，連一壟土地也沒有。這些無地和少地的窮苦人家，為了生活下去，不知探尋過多少條求生之路，但在解放前哪里有窮人的生路在？在今天仍然活着的貧農、下中農中，有五十五戶給地主種過租子地，有一百戶、一百零四人給地主扛過長活，有十九戶三十八人討過飯，有十九戶賣兒賣女，十九人當過童養媳。但是，這種種求生之路，帶給窮人的卻只有被剝削、被欺詐、屈辱和痛苦以至死亡。

他們之中許多人，上述的大部分路子都走過了，到後來仍然不免飢寒交迫，有的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麥專西隊老雇農司明一家，自從父輩起因為人多地少、年景不好，失去仅有的幾畝土地以後，在舊社會里，掙扎了五十多年，一家人始終擺脫不了受苦受窮。開初，他東借西湊弄來十幾元錢，交了上打租，租種了地主八畝地，不幸碰上了澇年頭，一年辛苦只收了一斗多高粱，連秫秸也沒撿回來。租

地蝕去了交租老本，地主夺了佃，租种地这条路没走通，只好給地主杜清扛活当二踮。在杜家刹^①，耨、拉、打，什么重活都干，一年工錢(二十八元)仅仅才能买两石多棒子，不够一家五口吃一季。无奈妻子領着三个孩子四出討飯，大麦、二秋拾点粮食，勉强糊口。誰料没过几年，連当长工这条路也被地主堵塞了。那年河东发水鬧灾荒，出来逃荒扛活的人多，杜家雇到更便宜的长工便把他辞退了。司明走投无路，只好到城里拉了一年洋車，但仍然不能养家活口。后来，連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也出去給地主当小半活。一家六口，三个人扛活，終年替地主当牛做馬，半饥半飽，到头来还是房无一間，地无一壠。园田北队貧农沈永珍一家的遭遇更加凄惨。沈永珍父亲扛长活累出一身病，被地主赶出来后，为了活命，到东壩一家店鋪打更当杂工。大哥沈国栋到城里当学徒工，混碗飯吃，后来被抓了劳工，嫂子被迫嫁了人，剩下他跟母亲两人靠討飯度日。討飯仍然不能活命，十三岁那年他到康姓地主家扛活。一家骨肉就这样被活活地拆散了。剩下母亲独个儿，孤苦伶仃，連冻带餓，眼睛瞎了，全身浮肿、化膿、生蛆，連站都站不起来，就只好在地上爬着到处去乞討。后来竟然倒在討飯的路上，被人抬回家，不到一天就死了。沈永珍一家儿口人在外苦熬生受竟养不活一个女人！这是怎样可憎的世道！

然而旧社会，在楼梓庄里像司明、沈永珍这样不幸遭遇

① 刹，当地土語，刹地就是耕地。

的又何止这两家？在三座大山压迫下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除了这种遭遇，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命运！

一贫如洗的艰苦生活

提起楼梓庄穷苦农民所受的苦来，那真是“黄连上边栽黄连，苦水里头腌苦瓜”，比黄连、苦瓜还要苦几分。

“食为民天”，且先从吃的方面说起。人们常说，解放前的农民是“糠菜半年粮”，其实，这里的许多农民一年连半年的粮食也吃不上。解放前，这里主要种玉米、白薯、麦子，谷子、高粱种得少，穷人想吃糠也无处弄，一年四季主要靠野菜、树叶度日。农民们经常吃的野菜、树叶有刺儿菜、酸菜溜、水鸡儿菜、山芝麻苗、曲麻菜、竹叶菜、灰灰菜、猪毛菜、人人菜、车轱辘圆、苦菜、婆婆丁、杨树叶、榆树叶、柳树叶、槐树豆等等，不下几十种。春天从野菜一露地皮就吃，一直吃到第二年接上新野菜下来，从年头吃到年尾。麦秋以后野菜多了，树叶大了，就把刺儿菜、榆树叶等采回来，用热水一抄，晾干后储存起来冬天吃。长工高德山、高德海哥俩冬天下工后，一天吃两顿野菜棒子面稀粥，两个人一顿才吃多半碗棒子面，顶多四五两粮食。长工高佩然，扛活挣的粮食仅够家里母子俩吃一季，其余三季全靠吃野菜。有一年，借来的三升高粱吃完了，高粱糠玉米皮子也用水泡过上锅炒着吃完了，后来竟连吃野菜的盐也没有钱买了。孩子饿得皮包骨，一看见又苦又涩的野菜团子就蔫蔫地躲进妈妈的怀里，连哭叫的力气也没有了。

那岁月，穷人生病不仅請不起医生，也沒法調养，連頓純米淨面的飯食也吃不上。雇农沈永利的父亲，扛了一辈子长活，累出了血汗病，临死前想吃点純玉米面的饅饅，家里都沒有。难得妻子到集市上把仅有的一件破棉袄当了，才給丈夫买回一小块年糕，可是等她拿回家来，丈夫早已咽了气，再也不能吃了。沈永珍的母亲討飯，家里粒米无存，临死时想吃杏子，沈永珍托人舍臉好不容易才賒来半斤杏子。

有些戶連摻野菜吃的粮食都沒有，他們每年从开春耨地、麦秋到大秋，趁地主給长工往地里送飯的时候，到地里赶飯，跟长工穷哥們討点湯湯水水来充饥。鮑金生弟兄三个，一年有好几个月，靠赶飯勉强活命。但是赶飯也不容易。一則地主們看得紧，一碰到赶飯的穷人不是打就是罵。地主杜文华給长工送飯的时候，飯担子后面总是跟着一帮窝子狗，防备穷人赶飯。杜文华吩咐送飯的說：“剩下的飯菜，就地喂狗，不許給赶飯的穷鬼吃！”有一次一个飯把^①在半路上偷着給赶飯的穷哥儿們一点飯，被杜文华知道后，挨了一頓臭罵不算，还差点被解雇歇工。二則长工們自己也吃不飽，沒有多少剩余給赶飯的穷哥們。

赶飯不成，只有討飯一条路好走了。但这也很难活命。地主老財視錢如命，家里养着窝子狗，討飯的要不着不說，还常常被恶狗咬得皮开肉綻。八九岁的張永江跟着母亲討飯，被狗咬得順褲腿流血，在家养伤很多天要不成飯。王祥家母子俩討飯，仍然不能活命，只好忍痛把四岁的小妹妹卖

① 做飯的长工。

給人家，逃得一条活命。

上面說的还是中流年景，一遇灾年，穷人的生活就更难熬了。多少人家卖儿卖女，四出逃荒！只一九三九年发大水，一年就逃出了二十多戶人家，有許多人至今未归，有的早已死在外乡了。故土难离，家有老小舍不得逃开的，終年以野菜、树叶度日，連又苦又澀的“共和面”也变成了“珍品”，輕易弄不到啊！长工高德海的父亲，实在餓得无法，誤吃了落生蕎麦苗，臉肿得像个大葫芦，两只眼肿得眯在一起看不見东西，連野菜也沒法去采。

其次，看看农民的穿戴。农民們一家老小肚子尙且顾不上，哪里讲得了什么鋪盖穿戴！一般农民的衣裳常常是破破烂烂，許多人簡直連破烂儿也沒得穿，每年一入谷雨节直到老秋，穷人家小孩子赤条条一絲不挂，大人光着脊梁，下身只穿条破褲遮羞。每到换季的时候最难。穿着破棉袄的，大热的天也脫不下来，沒有单衣换；到了老秋，穿着单褂的，又换不上棉衣裳。

春、夏、秋三季还好混一点，一到冬天更难熬。貧农赵文財十七岁的时候，还跟母亲睡一个被窝，一家五口只有一床又小又薄的破被子，后来他外出扛活拿走这全家人仅有的一条被子，家里人就頂着一条破門帘子过冬。陈文生家五口人全靠盖麻袋片子过冬，陈文生冬天冻得无法睡，把脚放在母亲身上取暖。王殿福一家八口才有一条破被子，他因此冻坏了手脚，落下了病根儿，直到現在也沒好。

盖的困难，穿的也困难。司明夫妻俩合穿一件破棉袄，

丈夫出外謀生，妻子在家帶着幾個孩子靠燒“蛤蟆毛”^①烤火才沒有凍死。許多人家解放後才第一次穿上了棉褲。長工高德明在數九寒天里，只穿着一條破褲衩，腿上套着一條母親討飯討來的破套褲，把屁股凍裂了，坐不能坐，站不能站，還得照樣給地主干活。高佩然在外扛活沒鞋穿，三九天也不得不光着腳丫子。張永江隨着媽媽討飯，身上披着爛布條、麻袋片，腳上穿着一雙拾來的破舊鞋子，走起來直灌雪。

再看看住的方面。解放前庄里的磚瓦房全是地主的，連一般中農戶都很少有磚房，而廣大貧農、下中農，一家幾口多數都是擠在又低又暗的幾間土房里。那年頭，地主們盼着發大水，一發水窮人借貸無門，只好變賣僅有的一點產業。僅三八北隊六十几戶人家，解放前就有十几戶賣掉了房子。有個叫胡拽子的農民，發水賣了房子，自己到口外逃荒，妻子嫁了人，從此家敗人散。

棧梓庄的地勢北面高南面洼，窮人多數住在低洼的地方，一發大水，窮人不是卖房就是塌房。一九三九年那次大水，緊靠小壩河住着的貧農高文清，五間土房全塌了，全家人住在四面透風的小草棚里，一直拖了五年才蓋起土房來。他一輩子塌過四次房，明知靠河近，地勢洼蓋不得房，住不得人，但是沒錢置買房基地，高崗處都給地主們霸占了，窮人哪里動得！貧農吳永順三間土房被一九三九年的大水泡塌了，蓋不起就串房檐租房住，到解放前幾年間一共換過十七家房東。

① 一種水生植物，晒干後可以當柴燒。

那年頭，窮人家有幾間土房就是不被大水泡倒，最終也脫不過地主豪紳的兼併。一九四七年二月，貧農張永江被偽大鄉長逼迫着賣掉了仅有的幾間土房，一家人搬到好久沒人住的荒涼的北坡地住。但是沒住多久，偽保長馮連貴說他們“私通八路”，又從北坡地給趕出來。

庄里約有五分之二之貧困戶，連一間土房也沒有，靠串房檐租房住，靠住坡地、大廟過活。貧農李玉山解放前共搬過三十多次家。有錢主的房租貴，遲交一步就得被迫搬家，甚至連小孩子撒泡尿都是罪過。有一年發大水，李玉山租的房子塌了，東西全砸在里边，一家人躲沒處躲，藏沒處藏，就在玉米地里淋了整整一夜。那份苦啊，真比黃連還要苦上幾分！長工陳文生一家人住在趙家坡地里，給趙家看墳，後來父親死了，撇下妻小，趙家地主立刻把他們趕出來，從此連坡地也住不成了。

窮人租房沒有錢，地主不租；住坡地看不了墳，地主不要。實在沒路可走，只好搬到廟里，跟一些外鄉來討飯的窮哥兒們住在一起。貧農何清、高老頭都在本村的五帝廟住過好幾年。貧農高德明白天跟着媽媽討飯，晚上在五帝廟過夜。冬天風大，窗上沒有窗紙，風吹刮得渾身上下連鼻孔耳眼里都是土。夜長天冷，連凍帶餓，高德明哭都哭不出聲來了。媽媽心疼得只好到外邊揀點干柴，燒起一堆火，烤熱一塊地方，把火灰挪到一邊，把他放在那塊熱地方，摟在懷里；等這塊地皮涼了，把火灰挪開再換個熱地方。就這樣熬過了一個長夜又一個長夜，在廟里整整熬過了三個冬天。

这哪里像人过的生活啊！

穷人们在旧社会，吃、穿、住是这样的苦，活命实在艰难；但是，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穷人们就是死，也死不起！许多老农回忆起当年的景况来，感叹地说：“那阵子穷哥们真是山穷水尽，死不起，活不成，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叫天天不响，喊地地不应！”赵文财的父亲死了，欠下了康家地主十几块钱，弄得赵文财一连扛了十几年活还没还清债。赵文财的哥哥给地主扛活累死了，他和母亲带着孝挨门讨要哀求，才算买了口薄板匣子埋葬了。高德山母亲的尸体一直在家里停放了三整天，没钱买棺材不能入殓。那时候，穷人家老人活着的时候，儿女无法赡养，死了以后想带点孝尽尽孝道也无法如愿。现任楼梓庄公社副主任郭瑞，母亲死了连个几指宽的白孝带都买不起，愁得郭瑞无法，只好把前来吊孝的表兄的孝带借下来戴在身上。

长工的苦难

长工是农村中的无产者，是地主阶级直接剥削的对象，在穷人中是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的阶层。

楼梓庄的长工分打头的、二脚、随活、小半活（又分里半活和外半活）和大车把式、饭把等几种。打头的工钱最高（最高一年也不过六七石^①棒子），但地主要求的条件也最苛刻，要耕、耜、扬、打样样农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活茬也最不好干，带领长工干活，干得少点慢点，地主不答应，要扣

^① 一石合一百五十市斤。

工錢，干得快了，二踮、随活这些穷哥們受不了。二踮、随活虽然掙的比打头的少，但是哪样农活也不能少干，鋤地、砍地^①跟打头的一样，都是一人一条壟。小半活掙的工錢最少（一年一石多粮），可干的活最杂性，家里家外，地里場里都得干。

长工不仅在經濟上受尽殘酷的剝削，連人身自由也被剝夺了。长工出卖劳动力在名义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只要踏进地主的門檻，就算套上了“刮青的皮套”^②，休想掙脫。地主們有許多恶毒方法整治长工，使长工們不得不終生为他們扛活。在庄里現有的一百戶、一百零四名扛过长活的社員中，从十来岁扛活，扛到解放前一直扛了十年以上的就有五十六人，占一多半。其中扛过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十八人，三十年以上的十二人，合計起来扛活二十年以上的又占了五十六人的一多半。而且这一百戶中又有四五十戶几代都是扛长活的。

不仅男人扛活，妇女給地主打短工的也很普遍。一家三代扛长活的赵文財，他母亲平均每年要打三个月以上的短工，連几个未出嫁的姑姑也常給地主刨苗、拔麦、掰棒子。

“端財主的碗，受財主的管”，給地主扛活，长工要受到种种限制和欺侮。沒进地主的大門之前先要找保人，三人通面，當場言定，长工保証不跑不偷。这就是說长工無論多么受苦受累受压榨，也得挨到头，一跑不仅个人的工錢完

① 砍地即割地，收割庄稼。

② 生牛皮去毛后作成的繩绳，最结实。

了，保人也要受連累。地主借口“有錢不雇本村活，天天回家看老婆”，要挾本村的長工不能歇工。沈永珍給地主康二癩子扛活，母親死了才准半天假。地主對住在家里本村的長工提出種種限制：天不亮必須趕到場房；老陽兒一露嘴就得下地；收工後，飯把不叫不准進飯房；不准在門口吃東西；進了庭院里不准東瞅西瞧，不准進二道屏門，等等。長工高二偏頭在地主杜文華家扛活，夏天鋤地地主家不澆水，渴得沒法，下工後喝了杜家院里的几口澆花的水，杜文華看見了，沒容分說，上前啪啪就是兩個大嘴巴。長工吃飯時不准講話，怕耽誤工夫。地主杜文華的母親一聽到長工們說話就罵：“飯把，切點咸菜，他們淡了口啦！”長工們在富農王殿元家扛活，開飯時，王的爷爷點上半根細香，香燒完了，無論吃沒吃飽，都必須立刻放下碗筷下地。大忙時，中午在地里吃飯，吃完了不能回家歇晌，天多熱也得在地里干晒着（因為樓梓莊的田間樹木極少），怕來回跑道，影響干活。“有病一兩天，三天找替工”，長工周老五鬧火牙疼，臉都腫了，沒錢找替工，康二癩子不准他歇工，施展出“虎狼醫”的本領來，給他臉上、手腕上、虎口上都扎上針，讓他帶着滿身的針，起棚搗糞。“地了場光衣裳破，臨到下工挨頓餓。”長工們冬至下工的時候，這一天只管一頓飯，干完活得趕回家吃飯。

比起成年長工來，小半活受的罪過就更多更大了。“小半活，‘掙錢多’，喂豬打狗擋雞窩，一天到晚不閑着，倒完尿盆才完活。”“掙錢多”，是一句諷刺的反話。小半活在地主家扛活，要經過“試活”，第一年白干。郭瑞十六歲時給何家

地主放四十八只羊、两口猪，每天挑三十多挑水，头一年白干，一个子儿没挣着。高德山给地主杜芝当小半活，一年才挣四块钱，仅仅够买五斗棒子。工钱少不说，还最受欺侮。里外半活简直就是地主家里的家奴，不仅要受地主老爷的气，而且还要挨地主家少爷、少奶奶、小姐、小少爷的打和骂。有个叫小铁梁的孩子，在康二瘸子家当小半活，整天挨打受骂：起床晚了，挨打；行动慢了，挨打；小少爷哭了，挨打；猪病鸡死，挨打；甚至连少爷少奶奶被老地主骂了，也要拿小铁梁出气。小半活在地主家里还不如财主家的一条狗。高德山当小半活时，长工们吃饭他喂猪，等他喂完了，饭也凉了，有时只剩下点锅底，经常挨饿。有的小半活甚至无缘无故被折磨死。贫农王殿福的兄弟给地主杜文华家当小半活，那年他才九岁，还没有地主养的骡子的下巴高。有一次拉墙，骡子忽然惊了，拖着犁杖跑开了。王殿福兄弟连惊带吓，连累带摔，被长工们抬回家，不吃不喝直说胡话，第三天晚上就死了。

长工们受尽地主的剥削和欺压，也得扛下去。这除了因为当长工的多数人家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不扛活没有别的出路以外，还由于被地主们施出的许多坏招套住了腿。长工黄文明，父亲死了，杜家地主假仁假义借给几个棺材钱，利上滚利，年年扛活，年年还不清，一落脚就干了三十几年。何全给康家地主扛活，欠下债，干了十几年，直到累出内伤，吐血死去还未还清。

同时，长工给地主扛活，只许他辞你，不许你不干。长

工們欠了債要是歸歸順順地扛下去，地主只記賬不要現錢；你一不幹，就本利一齊掏，誰也還不起，只得年復一年地扛下去，直到累死或者被辭退踢開為止。

地主是“雇少不養老”，長工們在年少力壯時，地主想方設法拴住你的腿不放；等到長工們一旦不幸套上扛活這根“刮青的皮套”，命運只有兩條：一條是累死，像趙文財的叔叔和哥哥，何全、王殿福的兄弟等人那樣；一條是老了，累出一身病，再也扛不動活了，被地主一脚踢開。回家後，生活沒有着落，到頭來還是脫不開累死、餓死、窮死。長工趙文財的父親，給杜家地主扛了一輩子活，刨高粱苗一天要刨四五畝，給地時雞叫頭遍下地，拔麥時半夜下地，大秋時，白天砍了一天的地，夜間扛着二百多斤重的大麻包上囤，一干就是大半夜。受了內傷，三十多歲腰就駝了，一干活直咳嗽。地主見他干不了活就把他辭退了。回到家裡，生活沒有辦法。有一天一大早剛要出去賣芽豆，吐了一次攤血，幾天的工夫就合上了眼睛。高德龍的父親，扛了幾十年長活，累出癆病來，被地主辭退了，家裡沒有吃的，冬天帶着病到井底下掏井，掙幾個錢糊口，被冰水一漬，病重了，沒過幾天就撒下了一家老小。

扛長活這麼苦，無怪長工趙文財的父親臨死前囑咐兒子說：“孩子啊，長大了要是有一點能耐，也別當長工啦！”但是，對於一無所有的赤貧戶說來，在舊社會儘管本領再大，明知是火坑也得往里跳，不然，靠什麼活命！

受不尽的欺压

楼梓庄是伪大乡所在地，乡以下設立联保和保甲。除了乡长、保甲长以外，还有为地主阶级看家护院的武装“壮丁队”、“自卫队”和給地主保护田园的“青苗会”、“伙会”一套机构。这些家伙，专干吃村嚼戶、欺压农民、魚肉百姓的勾当。穷苦农民除了在經濟上受到地主阶级的直接和間接的剝削外，还要遭受官府和地方上一群地头蛇的百般压榨和欺凌。

苛捐杂稅多如毛。一年三百六十天，什么官粮、出荷粮、青苗粮、伙会粮、壮丁粮、治丧粮、杂役粮、看青棍头的酒錢、秫秸錢等等，名目之多，不可胜数。貧农、下中农（包括佃貧、佃中农）一年辛苦，打下的一点粮食，除了叫地主剝削去一大半以外，剩下的一点还不够支付官府的各种稅粮的。連一般中农也不堪其苦，一年收获的一大半要被搜刮去。据初步統計，解放前夕每種一亩地，要交各种杂稅一百多斤。貧农王殿福，一九四七年剛剛交过官粮、青苗粮，又被迫交出五百斤官馬料，交过沒几天，又追加了一千五百斤。王殿福租种六市地，一年的收成不过一千多斤，交了租子以后余下的几顆粮食，还不够交捐納稅。最后連仅有的一点豆种也被“自卫队”搶走。交不出粮食挨頓毒打不算，有时还被拉走了牲口，搶光了家里的衣物、家具。刘永富一时交不出官粮，要求緩緩期，等借来再交，被打了一頓耳光，还拉走了正在給麦的牲口。連“自卫队”开枪打死了人，百姓也跟着

遭殃。貧农李清交不起乡长王殿臣借打死人的名目所要的五斗“治喪粮”，“自卫队”把枪栓扳得卡卡响，威胁李清要他去打这场人命官司。李清的儿媳妇連急帶吓，當場大便失禁，以后一听到“自卫队”三个字就打哆嗦，大便就失禁。那年头，穷苦人家的男人招毒打受欺侮，妇女也逃脫不过。楊玉被抓劳工在外，家里交不起官粮，妻子被抓到乡公所，吊在大树上抽了一頓鞭子，直打得楊妻答应借貸交粮，“自卫队”才放下了鞭子。

有的时候，官府要粮連他們自己也叫不出名目来，簡直就是明目張胆地勒索、搶劫。何淑敏的父亲有一天晚上在街上碰上了“自卫队”，見面就向他要粮。何說：“該交的都交了，还要什么粮？”“自卫队”被問得恼羞成怒，上前就把他拉到黑胡同里毒打了一頓，把他的汗衫、腰帶子都撕成了碎片。

数不清的杂役。日本統治时期，今天挖防空洞，明天修电台，后天挖地道。一个貧苦农民一年平均要干一个月以上的苦工。一九四四年秋天，張紹恩等十几个人被派到日寇一四一八部队电台的特务高桥那里修防空洞，白天在伪軍的刺刀威逼下干活，晚上不让回家，全被赶到一个又潮又黑的地堡里，口粮还要自己帶或家里人去送。国民党統治时期杂役更多。解放前夕，一个貧苦农民平均每年要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杂役。不出杂役就得出粮雇，穷人出不起粮只好干苦工。但是出了杂役的穷人，誰也沒看到一个棒子粒，全被乡长、保长們私吞了。一九四七年冬天，长工高德山从

地主家下工剛回来,就被派到通县去修城防沟、栽鹿砦,一干就是四十七天。說是干一天一斗棒子,結果一斤沒得到。貧农姚玉寬头一天出了杂工,第二天又派他去修城防沟,他說:“昨几个剛出过,怎么今几个又……”沒容他說完就挨了一頓毒打。

抓劳工抓壮丁。日寇統治时期,庄里常有人被抓去当劳工,有的抓到东北下煤矿,有的抓到日本干苦役。有人被活活折磨死在外边,有人直到如今沒有音訊。貧农楊玉被抓到日本煤窑里当劳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住的是席棚子,整天吃又苦又澀难以下咽的“共和面”掺牲口毛做成的窝窝头,吃得大便便血。冬天沒有棉衣,把麻袋剪上三个洞当棉袄。沒出一年就折磨死了。

国民党統治时期,村里有六十多名貧农青年被抓去当壮丁。王殿福有一天早晨被叫到保公所,說是集合练操,結果一去就被抓起来送到通县。一九四八年三月貧农郭瑞被抓兵的时候,要求跟家里人見一面都不准,把他五花大綁解往城里;他被抓走后,父亲因为挂念儿子,加上生活穷苦,把眼都急瞎了。貧农李万增,有一天一大早就从被窝里被綁走,連早飯都不許吃。家里生活沒有办法,妻子只好改嫁,他本人至今沒有音訊。李万增七十多岁的父母日夜盼望儿子有朝一日回家来!

惨遭日寇电刑。一九四五年春天,日寇电台的特务高桥以“私通八路,开会不报告”的罪名,把全庄一百六十多个男女老少抓去逼供,不招就上电刑。遭受电刑的有老人、儿

童，还有孕妇。高秀英才十五岁，就一连被电死过四次。李淑珍身怀四个月的胎儿，被罰跪半天。过电逼供折磨了一整天以后，日寇又把十八个年轻妇女鎖在楼下一間又湿又冷的小房子里，关了一天。两天后陈淑琴回家，孩子因为吃了她的餵奶汁，得了病拉肚子，不几天就死了。五十多岁的李容从电台回来后，吓傻了，不吃不睡，十几天后也死了。沈老五同样是被惊吓得病死的。从打过电直到日寇投降，庄里的农民們沒有在家睡过一夜安稳觉，許多人背井离乡逃落在外。高同逃到北京当小工；康永福的母亲逃到外村大儿子那里，康永福自己也帶上儿子文海离开了家，家里只剩下他的妻子和一个小儿子，但也不敢呆在家里，每天到庄稼地里东躲西藏。他的妻子因此折騰出癆病来。

其它种种欺詐凌辱。官府里的人随意打罵农民自不必說，“自卫队”的狗腿子們常說：“打是米，罵是面，不打不罵小米飯。”那时候，穷人們交不上租粮挨打，交迟了官粮挨打，“自卫队”到家不給好的吃挨打，官府嫌你“穷样”不順眼也挨打。长工陈文生有一次在街上碰到“自卫队”，“自卫队”故意喊道：“誰？站住！”陈文生随口“啊”地应了一声。“自卫队”就說他不“礼貌”，也被打了一頓。解放前夕，乡里的“自卫队”自知寿命不长了，夜晚不敢住在乡公所里，今天住張家，明天住李家。住到誰家誰就得把好房子騰出来，酒肉伺候，不然，借故找碴儿，非打即罵。有一次“自卫队”住在中营南队高老太太家里。夜間他們打牌，寻欢取乐，让高家的人給燒水、沏茶伺候着，叫高老太太給他們放哨查崗。“自

卫队”在屋里生火，把高家的扫炕笤帚都给烧了。哨兵们站在高家的房脊上，踩得房梁上直往下掉土，一家人终夜不得安静。吓得高家的新媳妇不敢回家，到处借宿躲藏。

* * *

“一阵风来一阵雪，一把眼泪一把血”，解放前任何一家贫农都有一篇充满辛酸痛苦的血泪史，这里记到的自然不及万一。不过，仅从这些记叙里，已经可以明白，今天，楼梓庄的农民为什么永远不能忘记过去，为什么在遇到暂时的困难时那样坚定乐观，为什么在和牛鬼蛇神作斗争时那样坚决，为什么会那样珍惜今天的幸福，奋发图强地创造着未来。

今天，楼梓庄的农民们，在党的领导教育下，革命精神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振奋，革命干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沛，正在大展革命和建设的宏图，听党的话，坚决跟着党走，永不忘本，永不变质，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家谱”一代一代传下去，为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美好而勤奋地劳动着！

階級仇恨永不忘

——樓梓庄地主階級罪惡史

解放前，樓梓庄以杜、康、王三姓大地主為首的地主階級，人口不到本庄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却霸占着全庄土地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他們採用各種手段，從農民身上刮來許多土地，又用這些土地，殘酷地剝削着農民，而且借用官府勢力，百般欺詐勒索農民，對農民犯下了滔天的罪孽。

貪、搶、霸、殺，罪孽如山

杜姓地主：以杜剛、杜文華叔侄為代表的杜姓地主在樓梓庄是占據土地最多的大地主。他們一姓就霸占了全村土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杜家不僅在本村有地，而且在外庄也有。東到黎各庄、沙窩，西到駒子房，北到雷庄、金盞，南到高安屯、馬各庄，方圓幾十里，都有他們大塊的土地。連本村帶外庄合計占有土地萬畝以上。

為什麼杜姓地主會田連阡陌，而多數農民却連立腳的地方都沒有呢？一方面是由於他們對長工和佃戶進行了無情的剝削壓榨，同時也由於他們使用了比這兩種剝削更為

野蛮的强取豪夺的罪恶手段。

俗话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杜家在村里强取豪夺的罪恶很多，这里仅举其中的几件。

地主杜刚，娶了三房太太仍然没生儿子，为了生子添孙继承他的万贯家业，杜刚请来风水先生给他另择坟地。这块新坟地竟然择在跟杜家连墙的张六家的二十五亩地上。杜刚知道张家不会无故卖田，就施下了一条吃人不見血的毒计，想方设法使出中人，让张六家租种他的土地。张六上了钩以后，由于租子重，年景不好，年年欠杜家的租粮，利上滚利，没出四年，就在杜刚逼租逼债的威胁下，含着泪水把祖业二十五亩地的老契，交给了杜刚。张六一家失掉了土地以后，老的气死、急死，年轻的只好投奔他方，另谋生路。

在楼梓庄村里，遭到杜刚毒手的当然不止张六一家。杜七在东坟山的二十几亩地和蒋连生在家南的十几亩地，都是这样被杜家兼并过去的。杜刚兼并了蒋家的土地不算，还逼着蒋家立刻挖走地里的祖坟，而且连坟四周的土都得一起挖走，扔在河里，怕蒋家的“穷土”破坏了杜刚家的风水。杜刚常常夸耀自家是“积善之家”，出租土地是为了“成全”小户人家养家糊口等等，可是他这种以租地为钩饵达到吞并土地目的的罪恶勾当，却无情地撕下了他的伪善面具。

兴讼告状，仗恃官府势力夺取农民土地，也是杜家惯用的毒招之一。一九二九年，给满清皇家当催头^①的地主杜

^① 替满清皇族催租催粮的。

芝，趁着“清室私产清理处”催令佃户留置土地的机会，买通通县官府，私造了假契、历年完纳地粮的粮串^①和佃户交租的假账，以佃户拖欠地租为罪名，把租种前清内务府上驷院马军旗地的十六户老佃户，告到通县法院，企图混水摸鱼，把十六户佃户有永佃权的五十八亩好园田，说成是自己的祖业，夺佃后据为己有。这个外号叫“小诸葛”“杜知县”的杜芝，先后告到通县法院、北平地方法院、河北省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等四处地方，官司一直打了十三年。杜家先是伪造地契，说五十八亩园田是他的祖产，索租夺田；后来又要把每亩地租由原来的一角三分增加到五元。虽然由于杜家伪造证据不高明，连官府也不得不承认“上诉人所执之民国十五年新租账不独纸色甚为鲜明，且其中关于每年付租之记载，墨色笔迹完全一律，显系事后一笔写成，自属不足采信。”（见“河北高等法院民事判决”原文）夺地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杜家还是强迫佃户们除了负担全部诉讼费用外，每亩地向他出了三十元的地价，这场官司才算完结。结果，这场官司有好几户佃户破产，佃户冯治安和冯永富，因为负债过多，连气带急，得暴病死去了。

不仅如此，在打官司过程中，地主杜芝还使出“自卫队”的狗腿子，夜间把被告佃户冯万增绑走，吊在大树上，打一个嘴巴问一句：“谁叫你过堂的时候那么能说来着？”一直把冯万增吊打了一整夜，冯仍然没有屈服。后来，杜芝又勾结

① 地粮单据。

了国民党某部一个連的兵力，請来一个国民党团长，杀了几口猪，摆了五十八桌宴席，准备了十八張輪子，打算在武力掩护下，强行給地夺回。由于十六戶佃戶和一些穷人的奋力抵抗，操起农具准备死拼，国民党的团长吓溜了，杜家才沒有得逞。地主阶级就是这么“王道”！

杜家地主越是豪富，越是貪婪无厌，哪怕穷人身上有一点油水可吸，他們也絕不放过。二十六年前，本村佃农姚玉清以每亩四老斗^①租子租种了地主杜文华十亩累死牛的“老蔓根”^②地。夫妻俩費了三四年工夫，把地里“老蔓根”等杂草除淨，地剛种熟了，地主杜文华就来增租，而且还得上納租，不然就要夺佃。逼得姚家夫妻把一年辛苦打下的全部粮食交了租粮还不够，只得到处借貸，花一石二斗高利，借了三石棒子。这一年姚家一家四口險些儿餓死。

别看杜家地主对待穷人这样刻薄，爱财如命，但他們自家的生活，却是非常豪华奢侈。杜剛家整年肥猪不空圈，喂肥了就赶到东壩肉杠上，然后每天派人专程到东壩取鮮肉，一天三頓美酒鮮肉不离口。抗战后期，杜剛、杜文华叔侄，全家迁居北京城内，不說别的，单只抽大烟一項，杜氏叔侄一天就要耗去一个长工半年的工錢。由此可見，他們耗尽了多少穷人的血汗！

康姓地主：康家地主发家不久，迁来楼梓庄不过五六十年的历史，原籍通县管庄人。康家的老一輩在北京当

① 一老斗合二十二市斤。

② 一种野生杂草，生命力很強，不易鋤淨拔掉。

車頭，靠剝削大車把式和從事投機買賣起家。一九〇〇年前後搬來樓梓庄，僱長工轉租了村北牛家鍋伙的三百畝租子地，暴發起來。在不到五十年的工夫，康家就由原來只有十幾輛大車發展到擁有一千三百多畝良田的大地主。這中間兼併了多少勞動人民的土地就可想而知了。

以康極、康鈴等五兄弟為代表的康家地主跟杜家、王家地主不同，在本庄一向以“善財主”自許。康二獐子康鈴會看病，二門上高懸着“又重桑梓”的金字匾額。但是實際上窮人求他看病，他根本不理。他說：“這幫窮鬼，連抓藥錢都沒有，還看病！”康家一個叫“傻肖”的看門的，瞅着窮哥兒病得實在可憐，不顧康家的家規，把病人領到屋裏，康二獐子隨便瞅兩眼問兩句，把病人應付走了以後，就把“傻肖”毒打一頓，問他為什麼破壞他康家的家規。打得“傻肖”以後看到窮人來看病，就吓得在院裏直打轉，不敢往屋裏領。只有跟康家“肩膀四齊”的主兒，康二才給看病，他把藥方全開在東壩“太和堂”藥房裏，為的是逢年過節，藥房送他一份厚禮。

康二一家對待窮人十分凶狠，正像長工們在一首民謠裏所說的：“康家鍋伙攔拐轉，飯賴使錢他不管。輕則罵，重則打，稍不順心就瞪眼。真慈善，假慈善，瞧瞧康二手中鞭。”康二經常站在他家院裏東南角的“更樓”上了望，望見哪個長工歇歇兒的工夫大了些，或者窮人到他的地裏挖野菜、拾庄稼，立刻吩咐管家、狗腿子到地裏把他們打罵一頓。有時康二自己提着“懶驢愁”皮鞭，騎着驢，在地裏轉游。一会儿

用拐棍捶捶地皮，看看长工們鋤的深不深，一会儿又蹲下来查看庄稼苗是不是让长工的鋤尖碰伤了根。有时天下雨了，他穿着雨衣，撑着雨伞，在地里监工，让长工們淋着雨給他干活。对待小半活，康二瘸子更是狠毒。有一个叫小鉄梁的小半活，只因为从窗眼里递給討飯的一小疙瘩窝头，就被他从东院追到西院，又从西院追到东院，打得死去活来。

当过伪乡长、“新民会”会长、伪联保长的康五麻子康栋，比他二哥康二瘸子更恶。他常对看青的棍头說：“誰从我的地边过，你們見了就揍，揍死了，我认着破上一頃地，没有什么了不得！”在他的指使下，用穷人們出粮出錢雇的看青的棍头，提着比大拇指还粗的皮鞭子和胳膊根儿粗的大馬棒，在大麦二秋里，經常抓住穷人吊打游街。有一年大秋过后，佃戶康文的老婆在康家地里拣庄稼，让康栋狠抽了一頓鞭子，打得她双膝跪地，仍然不饒。

除了看青的棍头、打手以外，康家四合院的大院牆里，还修起了三个把角“更楼”，牆上滿布枪眼。强迫穷人出錢雇佣来为地主們看家护院的“壮丁队”、“自卫队”出入其間，一方面为地主們看門守戶，一方面专干欺榨穷人的勾当。

除“壮丁队”、“自卫队”以外，康家还养了二十几条窝子狗，专门用来对付穷人。不要說討飯的不敢走近康家宅院，就是为他們扛活的长工动不动也被恶狗咬伤。一次，长工周二把到場院去，鞋破不跟脚，刚要哈腰提鞋，几条恶狗扑上来，就把他的耳朵給咬去了半个。

鞭子、棍头、“自卫队”、恶狗，这些就是康家地主用来治

服穷人的“看财宝”，这些就是康家的“慈善”，这些就是康家的“义重桑梓”！

不仅如此，康家地主对长工、短工还采取赖账的方式，进行超额剥削。有一年，讲好给长工王殿福工钱六十六元，年终付钱时，却只给六十元。王殿福跟康家讲理，反被康栋打骂了一顿。还有一年，麦秋时，康家雇了几百个短工抢收麦子。事先讲妥每拔一份（三亩半地）给二斗半棒子工钱。麦收完了，地主康栋偷偷召集全村地主们密议，企图集体赖账压低工钱，把二斗半棒子改为二元五毛钱。而二元五毛钱，在当时仅够买一斗多棒子，把工钱压低了一半还多。康栋还气势汹汹地威胁跟他讲理的短工们说：“五爷就是这些钱，嫌少不服气，就告五爷去！五爷破出去几石麦子，要了你们兔崽子的命！”赖了账还要置穷人于死地，可见地主阶级蛮横到什么程度！

王姓地主：以伪大乡长王殿臣为首的几家王姓地主比杜康两姓地主小一些，共有一千多亩土地。土地少一些，但是罪恶比杜康两姓却有过之无不及，是本村出名的恶霸地主。远的且不追究，就从王全、王振这一辈说起吧。二十多年前地主王振在村南白马河（即小壩河）南岸有一块三十亩地，种了没有几年，竟变成了三十六亩。原来他仗着自家牲口硬朗，每年早开犁早耕地，耕地时向周围邻地侵几寸。就这样年复一年，跟他一条墒的王姓和郭姓的六亩地就变成王振的了。传到王殿魁、王殿臣这一辈，更是霸道。王殿魁外号叫王大狗子，在村里耍拳弄棒，调戏妇女，毒打穷人，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村里有名的恶棍。他仗恃自家有钱，在私塾馆念书时，有一次逼着同窗馮連城吃芽豆，馮不吃不行，吃了又罵馮是“馋嘴”，并把芽豆皮吊在馮的耳朵上，順着私塾轉了两圈，用来寻欢取乐。馮連城頂撞了他几句，他操起尖刀就向馮連城的后背扎去，扎了两指多深的大口子。

在旧社会，地主阶级連杀人都視同儿戏，何况是伤了人！有一年，王殿魁家雇了个长工崔小菊子，因为实在受不了王家的欺压，还没有到下工的日子，小菊子就情願不要一年的工錢，辞工不干，到北京一家臭豆腐作坊謀生。但是王家不許，小菊子无路可寻，只好逃走。王大狗子发觉后，騎着自行車追到富豪村后身，一頓棍棒就把小菊子打死在雪地上。害了人命，王大狗子回到家里还反咬小菊子的中人王文源一口，說他把长工弄走了，向他要人。結果无辜的小菊子白死，凶手王大狗子逍遙法外，中人王文源倒被官府关押了八个多月。

王大狗子的二弟王殿臣，外号叫大白臉，是国民党时期的伪大乡长。催租、打人，要粮、抓壮丁，敲骨吸髓，无恶不做。一九四七年，貧农王殿福給他扛活，白天王殿福在地里干了一天重活，夜晚他还让王殿福到油坊炒芝麻。王殿福一直干了三昼夜，又困又累，实在支持不住，第四天下地耩谷，王殿臣說是耩得少了，罵道：“你干这点活够我給你的飯錢、工錢嗎？”上前就把王殿福毒打了一頓。王殿福受不过这口冤枉气，要辞工。王殿臣恶狠狠地說：“好，你辞工，辞工就抓兵！”果然第二年就被抓了兵。王殿臣对待他

的本族堂弟尚且这般凶狠，至于对待一般穷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王殿臣本人生活极端腐化。在乡公所里，挥霍从农民身上刮来的血汗钱如同粪土，大铁壶打酒，馱馱子馱肉。但对长工们却非常刻薄。他害怕长工吃得多，连咸菜里都要加上老盐。

国民党时期，是王家地主最霸道的时期。对于“脚踏楼梓庄，地都乱颠呼”的恶霸地主王殿臣说来，打人骂人已成“家常便饭”，往往在打够了骂累了以后，还要罚粮罚款。下中农高志忠的父亲，因为壮丁粮纳迟了些，王殿臣不仅指使狗腿子把高家的牲口从地里拉走，还把六十多岁的高老头吊在村里五圣庵的大树上，打掉了两颗牙齿；最后还罚了一石三斗多棒子。一九四八年六月，王殿臣指控贫农张振“私通八路”，把他抓到乡公所绑在板凳上，又打又灌，一连折腾了四整天。同时又把他年仅九岁的二儿子张永江抓去逼供，把他推在土坑里用活埋来威胁。第五天张家好不容易托人把张振保释出来，人已经奄奄一息，吐血拉血，一直卧床半年多。张振的伤还未全好，王殿臣又派人赶着张家搬家，逼得张家一家老小贫病交加，走投无路。

提起大白脸王殿臣的罪恶，楼梓庄农民没有一个人不切齿痛恨的。他当大乡长借用官府名义强征壮丁费、青苗费、“抚恤”费……还不能满足他的私欲的时候，就公开抢占农民财物。大约也是在一九四八年，本村沈永祥的父亲在河南岸自家地边上栽种的几十棵柳树成材了，正要卖出去

养家糊口。不巧这事被王殿臣知道了，王硬說树是他的。沈家惹不得他，只好任他砍去，最后哀求他給留下根碾棍材料都不答应。

杜、康、王三姓大地主的罪恶当然不止上述这一些。不过，单从这一点片断材料中，就已經可以看出地主阶级是怎样凶殘地欺凌压榨穷苦农民了。然而，解放前楼梓庄的地主富农还不仅仅杜、康、王三姓，还有何、刘、張等几姓中小地主。这些中小地主土地虽然少一些，但同样是騎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同样犯下了許多罪孽。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想見一般。

富农何昶，过去一家人都是恶霸。何的父亲何廷文，外号“何七皇上”，又叫“大馬踏何七”，沒事搬个大馬踏子整天坐在衙門口，凡是赶大車的經過他家門前都得下車步行，不然不是罵就是打。有一次何家的猪吃了貧农康祿的伯父康永珍家地里的豆子，康永珍把猪轰出地来，何七得知后，立刻操起一把四齿子，带着两个儿子赶到地边，用四齿把康永珍打成重伤，倒在地上。康永珍被人抬回家，好不容易把伤养好点，何七又到康家騎着屋門大罵了一頓，气得康永珍当时昏厥过去，紅瘡崩裂，第二天就死去了。何昶本人和他的儿子、孙子，一家三代都是霸人妻女的淫棍。何昶一人就會霸占过两家貧农的妻子。貧农郝鎖儿的妻子被何昶霸占后，郝鎖儿反抗不成，只得外逃，流落他乡，家里剩下老母一人，沒人养活，被迫改嫁。可怜郝家一家骨肉，就这样被拆散了。

狼都是吃人的；解放前楼梓庄二十几户地主，哪一户不是剥削、欺压农民的死对头？

手段狠毒，剥削惨重

天下烏鴉一般黑，杜、康、王等几姓地主同所有的地主阶级一样，也是靠惨重的雇工剥削、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来刮取农民血汗喂养自己，发家致富的。

一、雇工剥削。这是这几姓地主的主要剥削形式。以杜刚、杜文华为例。两家自种十八顷^①多地，自己不劳动，全靠雇长工和短工耕种。常年雇着三十二三个长工，大麦两秋还雇十几个月工和上百个短工。长工的工钱，打头的头等劳力不过六七石棒子，二脚和随活挣三四石，小半活只挣一石多一点。平均每个长工连工钱带吃饭杜家花费不了一千二百斤粮食。雇三十几个长工总共不过四万来斤棒子。但是十八顷地平均每顷以生产二万斤粮食计算，一共可以生产三十六万斤。杜家地主手不提篮，肩不担担，扣去饲料、种子雇工工钱以及其它管理费用，一年就从长工们身上榨取了二十五六万斤粮食。总之，地主们从一个长工身上一年就可剥削八千多斤粮食。全庄的地主们每年雇长工不下一百人，这些长工一年辛苦打下的八十万斤粮食，白白地流进地主的谷仓里。而八十万斤粮食，占解放前楼梓庄粮食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① 一顷相当于一百市亩。

从地主对长工們的剝削量上看是这样。下面再看看他們究竟是怎样殘酷剝削长工的。

首先从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上看。一年四季一个长工平均每天要干十个小时以上的活，大麦二秋甚至超过十四五个小时。麦秋的时候，长工們半夜下地干活，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收工。許多长工，扛到四十多岁，就累得弯腰駝背，咳嗽吐血。赵文財一家三代給杜家、康家扛活，累死了四口人（二爷、叔叔、父亲、哥哥），叔叔赵三才三十三岁就累得拉血而死，哥哥死那年才只有二十一岁。

那时候，长工一上工，地主們就讲死了“咸菜飯沒有假，有病三天找替工，早早晚晚，泥里水里，挑挑窝窝，甚么都得干。”长工姚伯新給富农王殿元家扛活，挑水时轆轤把儿把头打了个窟窿，剛歇工几天伤还没好，王殿元就逼他上工，不然就得出錢找替工。大秋时，姚伯新赶着馱馱子馱高粱头，王殿元要他也頂头牲口用，头顶肩背几捆高粱头。长工們無論收工多么晚，也得把場院归置利落了，把水缸挑滿了，才能吃飯。小半活小鉄梁在康二孺子家放猪，一个人喂養三十几头猪不算，放猪时还得“捎带手”給地主掏魚；夜間給地主家開門、关門、上門；白天扫地扫院扫街道；給地主儿媳妇帮厨燒火、倒泔水、做小鍋飯；篩牲口草、挑飲牲口水；冬天扫雪，夏天挑水澆花；圈鸡、掏鸡窝粪等等。赵文財在康家当飯把，除了做几十人的飯以外，还得喂養四、五口肥猪，黑夜篩牲口草、送飲牲口水，白天起棚垫圈，大麦二秋时揚場、垫車道，平日澆菜园子……。按說，一个整勞力，一

年也只能种四五十亩地，可是給地主扛活，連飯把、大車把式、里半活、外半活、放猪的都算上，平均每人要耕种六七十亩地。这样一来，一个整劳力每年就要担負百亩以上土地了。

耕种不过来怎么办？地主逼迫长工們提高劳动强度的鬼把戏是很多的。他們有时私下里給打头的长工搵几个錢，有时又搵給二脚、随活的几个錢，讓他們互相追赶，提高劳动效率。前面提到的赵文財的叔叔赵三，就是因为杜文华給随活的搵了錢，在一年大秋里割高粱时累死的。

其次，从长工們的吃食上看。杜康王几姓地主常说：“庄稼老儿不吃断谷粮”，地主粮庫里有的是棒子，可长工們却終年吃着半糠半沙的“口米”^①。杜剛家的飯把在长工們吃的稀粥里加了几顆黃豆，給杜剛看見了，就臭罵了飯把一頓。因为地主們怕长工换了口味，吃得多。地主菜园子里四季蔬菜不断，可长工們終年是“咸菜飯”。王家地主甚至在长工吃的咸菜里还要加上盐；地主杜清大忙时才給长工們两人分吃一棵葱。至于魚、肉、白面那是看也看不見的。王家地主因为名声太臭，长工們都不願意到王家扛活。地主“王大肚子”王全在雇活的时候对长工們說：“在我这儿干活，一天一个人給‘一錢油’吃！”其实，这是一种可耻的作弄人的騙局！原来王家在一根筷子頂上安着一个带眼的青銅小质錢，长工們吃飯的时候，地主婆先把小錢在水里沾一

① 从縣家口一帶販来的小米。

下，再到油瓶里沾一下，然后連水帶油一起滴到長工們的菜碗里。這就叫做“一錢油”。杜家地主為了“名聲好聽”刁買人心，過節時偶爾也給長工們一頓肉吃。然而，一則肉塊太大，四五兩重一大塊，杜家規定長工們要吃只能吃一整塊，不能吃幾口再放到盆里；二則，地主在肉煮得半生不熟的時候加了生水，把油全漬在肉里边，太膩，誰也不敢動筷子，吃了就要瀉肚子。地主們對待長工就是這樣刻薄！

再次，從長工們工錢上看。長工們上工時讲好一年工錢幾石棒子，但年終下工時，很少有人能夠如數領到手。因為長工歇工要扣錢，預支工錢要扣利錢等等。此外，還有更惡毒的辦法，那就是地主們看到糧貴錢毛時就把工資折成錢，看到糧賤錢貴時，又把工資折成糧。這樣一折一扣，長工們少說也要吃二三成虧。長工鮑金城有一年給地主杜貴扛活，一年工錢七百五十元。當時一石棒子二百八十元，夠買兩石六斗棒子。可是年終領工錢的時候，棒子漲到六百四十元一石，鮑金城無形之中吃了一多半的虧。趙文財有一年在一家王姓富農家扛活，讲好一千八百元（合三石棒子）一年，分三次付錢，每次六百元。誰料，等到第三次領工錢時，棒子由六百元一石暴漲到一萬多元一石，幾個月辛苦掙來的這六百元血汗錢，僅夠買兩個雞蛋的了。

地主們愛說他們的財產是祖上留下的，是他們用土地養活了長工們，而不是長工們用血汗喂肥了他們，請看，這是多么可恥的彌天大謊！

二、地租剝削。俗話說，“農民頭上三把刀，租子重，利

錢高，苛捐雜稅多如毛。”出租土地，盤剝佃戶的租子糧，是地主們另一種生財之道。杜剛叔侄二人經常出租五千多亩土地。每亩土地，杜家只凭“过話人”^①一句話，立下一个字据，無論年景好坏，都必須交納四老斗租糧。杜家一年就可收租糧两千老石，合四十多万斤。

每亩四老斗租糧，这是有形的剝削。此外，还有許多无形的剝削，例如：

1. 虛地租：杜家地主常常以七当十（或者以八当十），七亩地收十亩地的租。这样，每種十亩地就得白納八斗到一石二的冤枉糧。佃戶明知有鬼也不敢爭執，不然地主就要夺佃。佃戶陈文生种过地主以七当十的几亩地，辛苦一年，到秋后全部交租还不够。

2. 大斗收租：地主杜剛收租时，亲自出馬带着量斗的、算賬的，拿着双层底的老斗。收租前把斗里的二层底取下来，这样，一斗比普通的斗重二三斤。收租的时候，杜剛还让过斗的把斗向地上踹几下，将斗里的粮食踹磁实了，再装麻袋；而且在端斗装麻袋的时候，还让过斗的用胳膊带进麻袋一些粮食。有一次，长工刘順过斗的时候，斗装得不太磁实，杜剛上前就是一拳头，喝道：“重装！”这样，佃戶們每租种一亩地又被白白榨去一斗多。

3. 活租子：有一年佃戶張振租种杜文华五百地，讲好两老石租子。可是秋后杜家看張振丰收了，于是串通伪大

^① 过話人即中人，也叫保人。

乡长王殿臣和伪联保长馮連貴，到張家二話不說，把打下的近一千斤高粱几乎全部用口袋灌走，只剩下个囤底了。

4. 上打租：杜家地主怕年景不好，佃戶們交不起租，一般都逼迫佃戶預交租糧，佃戶沒糧，只好向地主出利借貸。这样，杜家又在地租之外捞了一笔利息。

5. 过期罰租：地主們規定，佃戶租糧过期不交，每亩加罰二升，一月之內还清；还不清，再加罰二升。

地主对佃戶們施行这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惨重的剝削，无地的佃戶是“地淨，場光，衣服破，一年辛苦一場空”，自不必說；即使是家有几亩薄地的戶，也不得不“地淨，場光，卖地逃荒”啊！

三、高利貸剝削：解放前，楼梓庄很多长工和佃戶既受地主雇工剝削和地租剝削，又受地主高利貸剝削。长工和佃戶养不了家，糊不了口，或者因为年景不好交不起地租，都得出三分至四分年息向地主借貸。长工何全，一九四二年在康家扛活，家里人口多，不够吃，年年利上滾利，后来，一年白干，还倒欠了康家三石棒子。何全还不上債，康家地主連何家的板凳都拿去作抵押。长工王文增家里房子破了，借了王家地主一些破磚烂瓦和几扇旧窗門。就是这点东西，利滾利，越滾越大，年年扛活，年年还不清，結果父子俩一直給王家扛到解放前夕还未还清这笔債。王文增說：“要不是解放了，扛到今几个，这笔債也还不清啊！”有的債主甚至在借貸当时就把利錢扣下。程玉山有一年借地主三石棒子，當場就被扣下一石二斗棒子的利錢，实借一石八斗，秋后按三

石还本。

此外，杜家和康家还进行商业剥削。地主杜刚在东壩开设了普济、义泰昌、德源恒三家粮行。大千投机倒把的勾当，操纵粮食市场，对穷人进行商业剥削。杜刚从事商业投机通常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叫着“串条子”，“义泰昌”的掌柜的用电话操纵市场粮食行情，每天在快收市的时候，把粮价压得最低才买进去；买进以后，当天夜里往粮食内掺拌用水蒸过的高粱壳子或者秕玉米，第二天一早再高价卖出去，或者拉到磨房里加工，这样每一百斤至少涨秤十来斤。另一种办法叫作“栽囤”，“德源恒”低价大斗把粮食收进去以后，交给“斗局子”，粮食涨价时，再高价小斗倒卖出去。那时，农民们秋冬季节，债主临门，无路可走，只得忍受杜家低价大秤的盘剥，把粮卖给杜家的粮行。到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又不得不忍受重利盘剥向杜家借贷，再到杜家的粮行高价小秤买粮。仅这一进一出，杜家每年又不知要从农民身上刮取多少钱财。杜刚常对人们说：“我到东壩街转一趟，就够我家三十几个长工一年的工钱。”

这里写到的，远不是杜、康、王等几姓地主对农民进行各种苛重剥削的全部内容，但就是从这些不完全的资料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旧社会到底是誰养活誰，誰是可耻的寄生虫了。

勾结官府，欺榨农民

解放前的地方政权，不論是抗战前国民党时的乡政府、

“伙会”，日本統治时期的乡公所、“新民会”，还是抗战后国民党时的大乡、联保公所、“青苗会”，等等，都是地主阶级統治压迫农民的工具。乡政权和保甲机构，一向被杜、康、王、刘几姓地主和他們的狗腿子把持着。杜貴、康栋、王殿臣、王貴、刘忠这些地主們都輪流在村里执过政。他們强迫农民出款出粮购买枪支、彈药，成立“壮丁队”、“自卫队”，为地主們看家护院，同时对农民捆绑吊打，敲詐勒索，百般欺詐。

这些吃村嚼戶的豺狼，除了代替上一层的主子向农民們橫征暴斂，搜刮民脂民膏效忠于上层統治者以外，还利用各种机会，巧立各种名目，压榨百姓，蹂躪农民。

这里只說几件事。

抓丁抓兵，大发壮丁財。国民党时期，村里每出一名壮丁，乡公所就向农民摊派二十石棒子雇丁費。但是穷人被抓当兵，誰也沒如数領足二十石棒子。据初步統計，国民党統治的三年間，伪大乡共向农民摊派約六百多石棒子的雇丁粮，大部分被伪大乡长大地主王殿臣等人私吞了。但是那时候即使穷人繳納了雇丁費，伪大乡仍然要抓他們当兵。长工赵文財本来已經出了两石多棒子的壮丁費（他一年扛活才掙八石粮），可沒过几天，伪大乡又抓他去当兵。他逃跑了，伪大乡又綁走他的母亲，向她要人。老太太連急帶吓直拉血，应了七斗棒子才算了事。伪大乡拈鬮出兵的时候，貧农李清家本来拈了个空鬮，伪大乡仍然把他二儿子抓走，至今沒有回来。

借故趁機，敲詐勒索。一九四七年九月，“自卫队”长杜

潤下令开枪追打一头脱了缰的白骡子，打死了农民李二召。伪大乡长王殿臣借口要为死者置棺发丧，抚恤死者家属，大肆聚敛，村里小户人家每户三斗半至五斗棒子。穷人家一时拿不出，就捆绑吊打，甚至把盒子枪往农民炕上一放，威胁说要把死尸抬到农民家里等等，恫吓农民。结果杀人的祸首不但没罪，还借故大敲竹杠，发了一笔杀人财。

解放前夕，今天这个税，明天那个捐，有时上午要了，下午还要，这帮刚走，那帮又来了。楼梓庄小户人家每亩地每年要出一百多斤各种名目的粮钱杂税。那年头，连有几亩地的人家，也活不下去。

打骂捆绑，恣意骚扰。伪大乡长大白脸王殿臣、伪联保长“小白秃”冯连贵、伪自卫队长杜润、班长“小黑驹”程德喜等人，他们打人吊人，把崇兴寺门前大柏树都勒下了深深的一道绳印子。天一黑街上就沒有人敢走。有一次，一个伪自卫队员故意找碴儿，硬要种园子的黄焕章回答口令，黄不知道什么叫“口令”。那条身着黑衣黑裤的恶狗，上前狠打了他一顿，还想活埋他的儿子。黄焕章被打后病了一冬，不能卖菜，没米下锅，过年时借了三斗棒子，棒子吃完了，全家只靠吃白菜度日。“自卫队”这些恶狗，用棍棒绳索吊打百姓，打腻了，就改用带刺的酸枣棵子和荆条，把受害者的衣服扒光，蹦着脚打，打得遍体鲜血淋漓，昏死过去，点些草纸熏醒过来，再继续打。

总之，解放前夕的楼梓庄，被杜、康、王几姓大地主和他们豢养的“自卫队”蹂躏得民不聊生，气息奄奄，已经变成不

折不扣的人間地獄了！

* * *

今天，樓梓庄的人民，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不僅推翻了地主階級的統治，而且還在黨的三面紅旗指引下，努力建設着自己社會主義的新家鄉。但是樓梓庄的人民深深地懂得，被打倒了的地主階級和其他反社會主義的牛鬼蛇神們，不會甘心自身的死亡，他們總想復辟，重新騎在農民的頭上作威作福。樓梓庄廣大的貧農、下中農社員們說：“不僅我們這一輩絕不能忘掉過去地主壓迫、剝削窮人的仇恨，絕不能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而且也要教育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牢記這些仇恨，掌握階級鬥爭這一銳利武器，保持高度政治警惕，永遠革命到底！”

[附]大 事 記

日寇在楼梓庄的一次暴行

——記“过电”

一九四五年春天，那是日本帝国主义黑暗統治时期，楼梓庄的老百姓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已經过了八年。八年中，他們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欺压，日本特务高桥、守备队长永田和“新民会”的一帮坏蛋們在村里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特别是被他們怀疑为“私通八路”的人，抓进电台便严刑拷打，甚至受电刑。楼梓庄遭受最残酷和規模最大的一次灾难，要算这一年春天全村一百六十多人的大审訊和受电刑。

这年阴历腊月二十七，夜深人靜的时候，几个八路军来到楼梓庄，他們敲开了伪保公所的門，又找到了保长和几个甲长，在中营街刘彦家开了一个小会。八路军向他們讲打日本鬼子的道理，并且动員他們支援八路军。

八路军开会的消息被日本鬼子的情报員告密了，傳到了日本鬼子的耳朵里。五月九日这天，汉奸狗腿子高振明通知全楼梓庄的保甲长和小学校的老师、学生在大庙集合，去电台回話。一早，四十多个保甲长便先到了电台，在一座楼前站定。“新民会”的狗腿子們一保二保依次序呼唤，一保的保长先被叫上楼去。进屋，正中放一張桌子，桌上安着一只电话机似的匣子，这是手搖发电机，桌子两边各有一把椅

子。高桥和永田一边一个，威风凛凛。高桥那连面胡子显得更黑更浓，更难看了；永田那白净脸也拉了下来，阴沉沉地。保甲长们被领进来，强迫他们跪在地上。最先被问的是宋万珍，高桥问他是不是跟八路军开过会，开了几次。宋万珍答不上来，高桥便把脸一黑，说：“你的不老实！”命令左右：“给带上！”“新民会”的人走过来，拿起两个夹子，夹在宋万珍的耳朵上，高桥拿起匣子上的摇柄，只听呼呼两下，宋万珍连跳了几跳，便失去了知觉。

接着问高同，又问康永福。高桥问他是不是在杜香甫家开过会，开的什么会，有什么人参加。康永福说不知道，高桥便拿起摇柄乱摇，康永福觉得心里哆嗦了一下，就倒在地上。不一会儿醒转来，高桥又说：“你不说，我通知道，有人报告我。”康永福说真不知道，高桥连又摇了几下机子，康永福直在地上打滚，舌头咬破了，血顺着嘴角流出来。待他再次醒转来时，高桥又问：“谁是干部？谁是青抗先、妇女会？”康永福心想，反正说不知道你就要电我，于是把心一横说：“是年轻的都是青抗先，是妇女就是妇女会，给八路军干事的就是干部。”“八路军开会都说些什么？”“八路军说，叫我们用镰刀菜刀全把你们砍死，一个都不留！”“八路军没有骂吗？”“骂了，骂你妈！”康永福说完，高桥反倒无耻地哈哈笑了起来。这样，连续审问，一直过了六次电才算罢休。不一会儿，高桥又下楼去拿了一根又粗又重的枣木棍子，在每人背上狠狠地打了两下，打到最后一个人，他手举不动了，就拦腰撞了两下，直撞得那人半年也直不起腰来。

这时，小学校的老师和六十多个小学生都被带来了，他们坐在电台外面的坟地上，听着对面楼上不时发出的惨叫声，直到四个保都已过完，才把老师叫进去。高桥问小学生是否跟八路军开过会，八路军都说了些什么，哪些学生开过会。直到天已黑尽，这批又饿又冷的小学生和保甲长们才回到家里。

日本鬼子并不就此罢休，第二天，又通知全村妇女去电台开会。这天，下着蒙蒙细雨，六十多个妇女，老老少少，有的被赶上大车，有的走路，高振明在后面端着大枪逼着来到了电台。“新民会”的人把她们按年纪大小分成三批，七十多岁，四十多岁，二十多岁各站一边。小队长永田对她们说：“谁和八路军开会要老实坦白。”然后把十八个二十多岁的妇女叫到楼上，一排跪下，逐个审问：给八路军做过军鞋没有，做过袜子没有，开过会没有。稍不如意不是棍打就是上电刑。张淑清只因多说了几句，高桥就问：“你怎么比别人能说？”就打了两棍子；王秀兰因为说没有和八路军开过会，就横遭电刑；高秀英那时才十五岁，也连遭过电四次。高桥还威胁她们说：“不说，外面坑挖好了，活埋了你们，要不叫洋狗吃掉！”李淑珍怀着四个月的身孕，也一直跪了半天。直到天黑，老年和中年的妇女才陆续回来了，但这十八个年轻妇女却被关进楼下一间又湿又冷的小屋里。雨还在不停地下，窗户外连张纸也没有糊，空荡荡的。风雨威逼着她们，她们饿了一天，但谁也不想吃东西，只是想念着家里的老小，不知这时正急成什么样子呢！吃奶的孩子饿

坏了吧，孩子們找不到媽媽正在哭吧！这一夜多难熬啊！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过了晌午，才算放回家来。人們含着眼泪迎接她們，心里却藏着仇恨。秦文兰的儿子剛五岁，他一把抱住了媽媽的腿說：“媽，你別害怕，等我长大了当兵去，拿枪打他們。”陈淑琴的婆婆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在大桥头等她，孩子自媽媽走后一直在哭，哭得嗓子都哑了。吃奶的小儿子一見到媽媽，立刻扑了过来，高兴地要奶吃。陈淑琴知道憋了两天的奶是不能給孩子吃的，但孩子餓极了，她来不及把坏了的奶挤掉就喂了孩子，誰知他吃了奶就拉起肚子来，不几天孩子就死了。

回到家来的人也不能安安生生地在家过日子。他們白天不敢沾家，晚上在地里趴到半夜，要到夜深的时候，看看沒有动静，才敢回家呆一会。有的更离乡背井流落在外。高同到北京当小工、卖菜去了；康永福一家五口人，媽媽害怕日本鬼子再来，不敢住在家里，到大儿子家去了，康永福也不敢呆在家里，但是爱人和两个孩子怎么办呢？娘儿仨一見他要去，都哭了，康永福看着他們，心里也实在不忍，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只得狠一狠心，带上十六岁的儿子文海离开了家，留下一个十来岁的閨女和媽媽。临走时，他对孩子媽說：“有那一天，三間房不塌，你不死，我們一家再团圆。”就这样，康永福带着儿子流落在外。家里剩下娘儿俩，每天带个餅子到地里去刨苗，孩子媽就这么得了瘵病。沈老五由于惊吓，受审讯回家不几天就死了。李容本来是个身强体壮的人，虽然已經五十多岁，但干活却不让小伙子。这

天从电台回来，一句话不说，坐在凳子上只管擦汗，不吃不睡，把眼睛瞪得老大，直直地发愣，一听见狗咬就到处躲。只几天工夫，人就瘦弱得不像个样子，到十多天上竟死去了。这时，李容的大儿子在外学徒，小儿子连重才八岁，一个八岁的孩子到处去报丧，哪个见了能不流泪？

这些事已经过去十八年了，如今，楼梓庄的人民远远离开了苦难的日子，但是他们没有忘记帝国主义蹂躏下的痛苦生活。忆苦思甜，更觉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也才更加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哩！

(許 以 記)

地主武装罪行录

解放前，楼梓庄的地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更加加紧剥削、欺压群众，他们搜罗一群流氓、土匪，豢养了一批自己的走狗或强迫贫苦农民为他们扛枪卖命，组织起地主武装。不管他们用“青苗会”、“自卫队”、“新民会”、“壮丁队”各式各样的名称，但都是为地主阶级看家守院、剥削群众、欺压群众的工具。

“青苗会”的真面目

抗日战争以前，楼梓庄就有了“青苗会”，直到解放时才取消。

“青苗会”，名义上是为全村护青，可是穷人哪来的土地？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为地主、富农保护庄园罢了。而“青苗会”十多个人的吃喝花销，却要全村的穷人来摊派。地主自己掌握“青苗会”，不但不需要拿出一文钱，而且借“青苗会”各种名目的派款来进行严重的剥削。

“青苗会”每年逢大、麦两秋就要起“会”，会长、副会长都是由那些地主村长、副村长担任。下面设有十几个看青的，他们每人手拿一根一人多高的杉木棍，因此，领头的叫棍头。棍头也就是村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流氓、混混。在不起会的时候，他又是村里的保正，总揽一切大权，可以胡作非为。

“青苗会”掌握村里的大权，在经济上又有利可图，因此成了大地主们争夺的目标。一九三二年左右，杜、康两家地主为争“青苗会”打了三年官司，胜负未分，结果是两家同时起“会”。这样，吃苦的便是穷苦农民，他们被迫同时要交两份“青苗会”的钱。

“青苗会”吃喝全靠穷人，而对待穷人却万般欺侮，有的看青的不许穷人从地边经过；有的穷人被诬为偷了粮食，给看青的抓到庙里，打起锣来，棍头腰里掖根大皮鞭，进门就喊“捆起来”。他们被捆在大树上抽打，打完还要用小绳牵着游营^①。有的则被罚钱、罚粮食，还要给看青的吃面。地主杜刚当会长，就经常骑上小驴去地里转游，看谁拣了他的粮食。有一次，倪国顺的父亲拾了点粮食，被看青的看见了，硬说是偷的，夜里忽然来了三四个人，把他捆在庙里的大树上，用五尺长的看青棍子打了一顿，罚了一斗五升棒子，还把他家的锅端了，半夜被放回来，又不许住在家里，把他撵了出来。冯振山因为没有吃的，拣了一点棒子，就给捆在松树上，棍头用带刺的树枝抽打，抽下去拉一下，打得满身是血。杨树华因为尽吃野菜，有一次挖了几块白薯，便被抓去游营，前面一个打锣的，后面一个拉绳的，杨树华走在中间，边走还强迫他念：“谁叫我偷白薯。”一不念，棍头就拿起大鞭子在后面抽。刘永利的女儿刚十五岁，有一天在地里拣了点柴禾，叫看青的看见也被痛打了一顿。陈永富家

① 即游街。

里很穷，沒粮食吃，光吃野菜，有一次陈永富的爱人掰了两个青棒子想給孩子吃，剛走到家，棍头正在門口等着，青棒子被翻了出来，他們把她捆在树上打，又拉着游营，还要罰二斗棒子。从此，棍头天天到她家来守着。隔壁街坊看小孩餓得可怜，給了几个煮棒子，棒子心丢在地上长了毛，被他們看見后，又硬說是陈永富偷的，把他帶到庙里，非叫游营不可，边走还要逼他說：“誰叫我偷棒子。”陈永富明明沒有偷，怎么說得出来？一不說，大皮鞭子就抽过来，走一步打一下，从东头走到西头，回到庙里还要画押，罰五斗粮食。解放前，穷人受的是多大的侮辱啊！可是，这还不算，“青苗会”的一帮人，看見誰家老实，就明目張胆地去地里搶粮食。刘永利家租了五亩地，这一年棒子結得特別大。有一天，邻居告訴她，有十多个大老爷儿們在她地里掰棒子，还赶着一輛駱車；她听說后連忙赶去，果然見一帮看青的在掰她的棒子，边掰边往駱車上装，五亩地都已掰了一大半。她迎上去阻止，看青的却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恶狠狠地說：“这主儿掰的，你要怎么样？”接着十多个人把她圍住說：“要打要告随你便，就是要掰！”刘永利无法，只好說：“我去告訴保公所！”看青的便拿着镰刀在后面追她。刘永利来到保公所，見保公所沒有人，就拿起鐮打了三下。保长跑来質問她为什么无故打鐮，刘永利讲了緣故，保长反倒把她捆在大树上打了一頓，还罰她五斤面二斤肉給看青的吃。“青苗会”就是这样欺压穷人，可是那种年头，穷人到哪里讲理去？

“自卫队”“新民会”一样欺压群众

一九四一年，馬德山当乡长搜罗了地主和土匪、盗墓匪的十多支枪，成立了一支二十多人的地主武装“自卫队”。

馬德山在軍閥混战时期，当过手枪连连长，以后又当过盗墓匪。吃喝浪蕩，抽白面扎嗎啡，是个花钱不睁眼的人。沒吃的时候，康家給他吃喝，沒花的时候，康家地主借錢給他，因此，他死心塌地为康家地主办事。

成立了“自卫队”，馬德山更加耀武揚威起来。他盖房，要大家給他摊錢，房盖好了，又要大家給他祝賀，給他搭大棚，强迫全村人摊錢送了两个大銀盾。狗腿子們抬着銀盾在村里走，真是威風凜凜。他不仅向各村派款要粮，而且还不断敲詐勒索，强迫穷苦老百姓三天两日給送东西，要鸡要面，只要他一句話，或是一張条子，就得給他送去。張淑华是个寡妇，带着两儿一女，生活本来就十分艰难，全靠給人刨苗、納鞋底过日子，馬德山却还要她經常給送白面。老乡們都气憤地叫他“炕头王”，說他只要在炕上动动嘴，別人就得把东西給他送到。正因为經常向老百姓要粮，老百姓就越来越交不上粮。馬德山又想了一个办法，一天傍晚，他命令“自卫队”在河南岸打了一陣枪，假說是八路軍被他們打走了，要不是他們，八路軍来了百姓将如何遭殃等等，借此又向群众要粮，大肆搜刮。

“自卫队”吃穷人喝穷人，还要打罵、敲詐穷人。陈永富家里很穷，借別人的菜园种了点菜，算是两家合伙。“自卫

队”天天去拔菜，摘茄子。陈永富便和犬乡长馬德山說明原因，請他让“自卫队”不要再去拔菜。誰知第二天来了一帮“自卫队”，把陈永富帶到庙里，捆起来狠狠打了一頓。日本投降那年，馬德山又无故說陈永富多占他一分地，开口就要二百块钱；陈永富无法，只好找人借了一百元給他。馬德山經常依仗日本特务高桥的势力，今天要抓这个，明天要逮那个，进行敲詐。高德明是个穷苦人，从小住小庙，大了串房檐，一直沒有安身之处，因此一家人省吃儉用，男的給人扛长活，女的給人刨苗、納鞋底，总想盖三間房。那一年，租人家五亩地收了点高粱，又借了两石綠豆，把衣服也当了，用四个麻袋縫起来当被盖，一家人二年沒敢吃淨面饽饽，尽吃野菜，总算对付着买了块盖房的地。不想买地不几天，就被馬德山叫到家里，馬德山坐在炕上一边吃着涮羊肉，一边說：“你扛长活扛得还不错啊！都买地了！高桥說你那錢不是好来的，要弄你！”高德明連忙解釋，馬德山却不耐煩地說：“干脆跟你說吧，跟你借俩烟錢有沒有？要一百！”高德明哪里有錢，馬德山便黑着臉說：“那你就等着吃黑枣吧！要不等着到河套去！”高德明无法，回家后只好把仅有的二亩地典給人家，拿了七十块钱給馬德山送去才算完事。

“自卫队”后来改成“壮丁队”，日本統治时期，又改成“新民会”，日本投降后仍改为“壮丁队”。反反复复，几經变换，受苦的仍是穷苦老百姓。“新民会”帮日本鬼子抓丁、抓工，老百姓經常被赶去修馬路、炮楼，挖葦子沟，修铁路。一去便是十多日不让回家，有一次在日本特务高桥那里做工，

做完了不让回家，跪在地上。那时正是十冬腊月，人冻在地上起不来，晚上又被赶到地堡里关起，扣了四天才让回家。有的被抓劳工，就更加凄惨，楊树华的爹一去就没有回来。“新民会”小队长仗势霸占妇女给他当小老婆。他們的恶行也是不胜枚举。

“壮丁队”的罪行

一九四六年，杜潤当了“壮丁队”队长，直到解放。在这几年中，他們和伪大乡长王殿臣、伪联保主任馮連貴勾結在一起，在村里催租要粮，抓丁抓兵，敲詐勒索，无所不为，真是弄得怨声載道，民不聊生。

他們为地主和官府催租要粮，稍有迟延便是打罵，再不就是把牲口牵走。刘永富一家四口人，只有二斗口粮，“壮丁队”的班长程德喜来催粮，刘永富求他允許立冬之后下了工再交，程德喜不答应，站在炕沿上就打刘永富两耳光，而且掀开錢柜硬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搶走。高致中的六十岁的老父亲因为交不起粮，被吊起来打掉了两颗牙，請人百般說和也不行，非要二百斤棒子不可。他上街，被王殿臣看見，又說他私通八路，叫他跪在街上。王凤鳴也为交不起粮，被馮連貴和八九个“壮丁队”圍着打，打死过去，又熏过来。过了几天，他女人推碾子，被“壮丁队”的人看見，說他有粮食不交，又毒打一頓，打得二十多天起不了炕。“壮丁队”的派款更是咄咄逼人。赵文財因为交不出“壮丁队”的枪款，便把他的牲口从地里牵走。王殿臣曾經下命令說，拿不出粮食的

就牽牲口。有一次，貧农出身的“壯丁队”員姚伯新想：“王殿元也沒交粮食，我也把他的牲口牽了。”姚伯新原来在地主王殿元家扛半活，因为受不住地主的欺压不干了，王殿臣說：“不扛活就得当兵，不上通县就得当壯丁队。”姚伯新只好当了“壯丁队”。这时，他就乘机把地主王殿元的牲口拉走了，不想王殿臣因此大怒，說：“別人的牲口可以拉，我兄弟家的牲口怎么好拉！”把姚伯新狠狠地打了一頓。这真是清楚地暴露了“壯丁队”就是为地主看家守院的真实面貌。

“壯丁队”抓丁抓兵，弄得穷人妻离子散，一家不得团圆。一九四七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保公所通知所有青壯年男人到大庙集合上操。排好队，“壯丁队”便把他們押到馬各庄，关在一个大院里，三十岁以下的人都被留下送到通州当兵。何淑敏的丈夫被通知三天內如交不出一百石棒子就要来抓兵，何淑敏家哪里拿得出来，一家人便逃了出去。程德喜到她家找不到人，連門都給封了。有一天，何淑敏的丈夫从外面回来，被程德喜知道，便把他逮走了。馮振山是馮連貴、程德喜冲进家来逮走的。高德海是扛活时被程德喜逮去的，那时已經該吃飯了，他竟連飯也不让吃一口。郭瑞被抓走时才十六岁，他父亲追到大桥給他們跪着求也不行。曹玉林被抓了时，王殿臣說：“你們哥儿俩，得去一个。”曹玉林反問道：“你們哥儿几个？”王殿臣大怒說：“你別管我們，你反正得去！”这时，曹玉林的愛人正坐月子，他也只好去了。他剛走，又抓了他的兄弟。李寬的父母六十多岁，弟妹还小，主要靠他劳动。有錢的人家兄弟多也不抽兵，却偏要

他去。王殿臣說：“別人当兵給十八石棒子，你去当兵給二十石。”李寬走后却一顆粮食也沒給，家里只好去要飯。直到快解放了，王殿臣才假惺惺地給了二亩多地，來遮盖他的罪惡。刘印在抽壯丁抓鬪時本來是沒抓到的，“壯丁队”却說抓的鬪不算，不交二十石棒子還得当兵去，刘印交不出棒子，只好当兵。那种年月，枪杆子在地主手里，他叫誰去当兵，誰就得去，哪里还有穷人的活路？

至于欺压勒索群众更是經常，“壯丁队”平日住在群众家里，大吃大喝，他們打牌还要群众給他們瞧崗。住在誰家里如不請他們喝酒吃肉，就賴住不走。柴禾燒完了，連笤帚疙瘩都給燒掉。有一天，馮連貴帶人來到苏老太太家，一進門就把她打得順嘴流血，說她窩藏了八路，还拿枪把她丈夫的腿打穿了，吓得他們不敢住在家里。第二天，“壯丁队”又到她家把鎖着的門砸开，衣物搶劫一空。又有一次，馮連貴家养的羊到刘印地里吃麦苗，刘印父亲罵了一句，当天晚上馮連貴便挎着盒子枪到刘家來质問，把枪扔在炕上威逼他。第二天晚上“壯丁队”又把刘印的父亲拉出來，程德喜用皮帶抽打他，边打边走，一直打到場院，打得他十几天起不了炕。这些欺压群众，无故打罵群众的事真是举不胜举的。

地主武装的罪惡是写不尽的，多少世代的阶级压迫，多少世代穷苦农民的血泪是記不完的，它們一代又一代深深地写在劳苦人民的心里。如今，黑暗的日子过去了，但是，要牢牢地記住这笔仇恨啊！

（許 以 肥）

楼梓庄文化教育今昔

解放前，楼梓庄的文化非常落后。

文化是上层建筑，它的发展，要决定于经济的状况。广大农民经济上极其穷困，长年不得温饱，根本无权也没有可能过问文化教育。正像一首民歌说的那样：“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穷苦人整天忙，佃种地攬牛羊，吃不饱穿不暖，哪有钱上学堂！”

这样一个两千来人口的大村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没有什么学校，只有几个时开时停的私塾，教着十几、二十多个门生，其中绝大多数是有钱人的子弟。比如，有一个姓杜的塾师开了一个蒙馆，只收杜家地主的子弟，连其他几家地主的子弟也很少收，至于一般农民的子弟，更是登不上那么高的门坎了。辛亥革命后，因为开办新学，才在一九一六年在崇兴寺里办起了一个“国民小学”，只有一个教师，一个班，二三十个学生，上课时，四个年级坐在一块。这样一直延续了十五年后，才增到两个老师两个班。此后，一直到日本鬼子统治时期，这所“国民小学”，非但没有发展，还像风中残烛，时燃时灭。一九三三年，杜、康两家地主为争权忙于打官司，学校因为无人主持，停办了一年多；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因为日本鬼子要成立大乡占了校舍，也停了一年左右；此外，因为鬼子骚扰，旱涝天灾而停学更是常见。一九四七年才成立完小，学校由民办改为官办，学生

人数增加到五个班一百多人。这算是楼梓庄文化事业的“兴盛时期”了，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能自始至终念完小学，多半还是富家子弟，起码也得是小康家庭。穷人家的孩子，即使费尽心思，筹得几个钱进了学校，也常常只能念个“冬三月”，就得出去学徒或给地主当小半活。

那时文化的落后，不仅表现在学生人数少上头，也表现在教学的方法、教学的质量上头。私塾时期，教学的方式，完全是“死读书”，蒙童背不出，塾师拿起戒尺就打，或冲着圣人牌、顶着砖块罚跪。而塾师又没有经过什么专门训练，练武术的、宰猪开肉杠的（当时有一个姓宗的塾师就是干这行的）都来滥竽充数。成立新学以后，颁行了新课本，学生学上了国文、算术。但是课文的内容，充满了封建性的糟粕（当时“修身”一课，宣传的就是封建道德）自不必说，学生的学习质量也很低劣，念完四年，又重新“回炉”的情况也是常见的。

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前夕，这所“国民小学”建校已经三十二年，仍然是残破不堪，全校连破庙在内，一共才有二十来间校舍，桌椅等用具都不齐全，至于体育用具、教学模型、课外图书等教学设备，都一律没有。学生人数还是五个班，一百多人，教职员十一人。所招收的一班高小学生二十人，是解放以后才毕业的。

偌大的村庄，解放前只有两个初中生，两个高小毕业生，还都是大地主的子弟。三八北队共有六十多户人家，解放前只有三户中农人家子弟念过初小，其中有一个还没念完。占

全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穷苦农民，絕大多数是文盲。

由于沒有文化，給农民們造成了极大不便。住在村西头的人，連念一封信，也要跑二里地到东头来請学校的老师帮忙。要是孤身奔走他乡，人生地不熟的人更是困难。貧农李清的儿子被抓了兵以后二年多，才求人写过两封信回家，弄得全家人都为他提心吊胆。每年过年，乡亲们都有貼对联的习惯，可是，全庄能写对子的人，只有寥寥几个。据当过教师的沈永富回忆，当时，他每年从腊八就开始，直写到除夕才完，有时还得赶通宵。有的人直写到大年初一了才貼上对子。由于不識字，把对子貼倒貼錯的現象也常有。穷人作买卖糊口，連記賬也不会。本庄有一个姓楊的做小买卖的，用符号記賬，以点点儿代表酒，用画方块代表烟，有时弄錯了只好亏賬。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楼梓庄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文化教育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現在，楼梓庄小学，經過了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几次扩建，校舍已从二十三間扩建到了四十六間，扩大了一倍，連作教室用的破庙也整飾一新，还添制了各种各样的教学設備。学生人数由一百多一跃而为五百多。現在每年都有近百个毕业生走出校門。解放以来，截至一九六三年暑假，这所学校共培养出九百多个毕业生。其中大部分是貧下中农子弟。

一九五八年，还在村北，修起了一所嶄新的中学，在校学生有三百多人。这給庄上的小学毕业生提供了良好的升

学条件。

現在,全村两千多人口中,青壯年文盲几乎絕迹。据一九六三年統計,光回乡生产的中学毕业生就有一百四十七人,相当于全庄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在乡青年二百四十七人的百分之五十五强。适龄儿童都获得了上学的机会。解放前,能上外地升学的只有地主家的子弟,現在貧下中农的子弟,也有很多上外地升学的。貧农姚靜华解放前,靠父亲扛活为生,压根儿念不起书,現在姚靜华的弟弟念上了哈尔滨軍事工程学院。貧农李清因为穷困,世世代代沾不上一點文墨,現在,他的孙子李明已經是高等学院的毕业生。全庄有二十九戶劳动人民的子女上了大学,至于念上中学的例子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現在,在回乡知識青年中,担任生产队和大队各級领导职务的有二十人,担任生产队、大队的記工員、會計、統計的有十六人,担任电工、机手的有五人。他們在发展集体生产上,在实现农村的“四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莫文珍 記)

三代长工苦难熬

——长工赵文财一家三辈的遭遇

如今队上跟我一起干活的小青年，瞧我犯了寒腿病也不差什么不爱歇工，就问我：“文财叔，你腿有病根，干农活不觉着累吗？”每逢这时候，我就爱跟他们念叨念叨解放前我们一家三代扛长工的苦日子。

我今年四十整了。在旧社会我生活了二十七年，扛了十四年长活。那阵儿，好多人都不知我叫什么名字。起小，地主家喊我“放猪的”、“拉墙的”，再大一些，喊我“赵饭把”。甭说别的，咱穷人在旧社会连个大名也叫不开。

说起我们一家三代扛长活的苦水，话可就长了。

扛活家門

在旧社会，我们一家三辈儿扛活。我爷爷那辈儿老哥四个，哥仨在本村大地主杜家、王家扛了一辈子。我爷他们还没下工，我父亲我叔他们又到杜家扛活。轮到我这一辈，我哥和我也是在够不到牲口嘴巴的岁数，就给地主家拉墙、放猪了。在旧社会，财主家讲究给儿孙后代积攒房产田地；

咱穷人，老人給留下的，只有一双扛长活的手！

那陣儿，一个穷扛活的，一年頂多掙五六石棒子，这点錢哪够养活一家老小的？別看我們家那么多扛活的，可总是年年掙，年年淨，年年亏。碰上个灾歉年头，就得向財主家借貸；一借，就还不清；还不清債，就甭想动窝了，地主把工錢压得再低，咱也得忍了；咱想不干，得先把債錢本利还清再走。財主就是拿这个毒法儿拴住咱。那工夫，扛长活的，正像有句俗話說的：“一年长活二年穷，三年不扛都不中！”只要咱一跨进地主家的大門檻儿，刮青的皮套就給咱預备下啦，一上套，一輩子都拉不断，脫不开！

我二爷，在杜家苦熬生受了一輩子，身板折騰得很弱。可只要咱不死，地主就不会白饒咱。我二爷干不了重活，地主叫他給喂牲口，一直到七十多岁了，还让他給看場院。看場院这活更累，白天黑夜不得睡不得吃。有一年剛完秋，我二爷就累得趴下啦，头、臉、渾身上下都肿了。杜家瞅着我二爷不行了，再也榨不出油水来啦，才一脚把他踢开不管了。沒轍儿，我叔把我二爷从杜家場院背回家，只几天就死了。可怜他老人家，辛勤劳累了一輩子，临死时穿的破棉袄，露肘缺襟，連肚臍儿都盖不上。……

那年头，穷人家的妇女虽說沒有扛长活的，但也得給地主打短卖零工。我奶奶、我姑姑她們每到大麦二秋都出去打短。我母亲春天給地主刨苗，拿小鎬子耨二遍，麦秋給地主拔麦子，大秋給地主剥棒子皮，一年总要在外打三个多月的短儿。我小的时候，母亲起五更去打短拔麦，把我跟妹妹

也帶到地里帮着干点。

一家人就是这样拼死拼活地干，日子也总不好过。打我记事起，我就没见我父亲、母亲穿过棉裤，有一条补得囫圇的“灯笼裤子”过冬就算满好了。一家五口，就有一床短得露脚丫子的破被。冬天北风一吹，刮得破窗纸直煽忽，全家人冻得谁也睡不着。我和妹妹争着那床破被，从炕头拉到炕角，满炕“拉大网”，母亲在一旁愁得直叹气。后来我去扛活，母亲把这床破被给我拿去上工了，全家人一年到头只盖着个破布门帘子，景况就更惨了。我的寒腿，也是在外边扛长活穿不上棉衣裳冻下的病根儿。

叔叔的死

如今在队里干活还有人嚷累，可他们不知道旧社会扛长活的受的罪孽有多大。

解放前那阵儿，地主老财明里剥削你不说，还暗地里使坏招儿压榨你。有时候他偷偷摸摸地给打头的捶几个钱，叫打头的拼命带着随活、二踮干；有时候又捶几个钱给随活、二踮的，催着打头的干。那帮恶狼，灯草棍子还要榨出四两香油哩，何况咱是个五尺多高的扛长活的。穷人身上的油水不干，他们怎能甘心！“七七”事变前，我叔赵三在大地主杜文华家扛活，当打头的。有一年地里的庄稼刚刚拾掇完，我叔捧着胸口回家来，一头倒在炕上就爬不起来啦，嚷着心口痛，气闷，堵得慌，滴水不喝，粒米不进。人瘦得皮包骨，脸儿蜡黄蜡黄的，一丝血色都没有。家里没钱请大夫，

我嬸光在一旁抹眼泪干着急。没法只好央求地主預支几个工錢,可是狠心的財主,早知道我叔不成了,說什麼也不支。就这样干挺着,我叔来家只六七天的工夫,就撒下了我嬸和一个孩子,合上了眼睛。那年他才三十三岁。

天哪!我叔素来身子骨结实强壮,要不地主也不会用他打头儿。怎么一下子折腾成这个模样?我叔临终时才告诉我嬸:原来是杜家地主使坏招儿把他累死的,气死的!那年大秋前,地主杜文华从外村找来几个亲戚,背地里一人插给了够买一件粗布褂子的錢,說大秋活多,叫他們攢攢打头的,把活做得麻利点。那天,割高粱,一人八根壟。一开镰,那几个使了錢的家伙,就跟我叔較上劲了,一步不落,紧追快赶,赶了整整一天。我叔是个刚强性子,把小褂脱了,咬牙拼命紧紧向前赶,头天沒让他们赶上。第二天一早他們又赶,末尾,趁着我叔解小手的工夫,他們到底赶到前头去了。晚上收工回来,老地主嘿嘿奸笑着問我叔:“打头的,今天的活怎么样?你这个打头的工錢,我看該……”我叔一听,立刻气炸了肺,一口小米沙子飯沒咽下去,就奔場院了。我叔越想越气,可又不敢公开頂撞,只好打掉了牙齿往肚里咽。但是这口气实在叫人憋得慌,当不成打头的,扣工錢不說,这地主安的是什么样的黑心啊!这一气,当晚心口就疼得不得了。可那陣儿穷人有病算个啥,有病也得强撑着干。收秋活累,加上心口疼,吃不进东西去,身板越来越弱。等放镰儿的时候,我叔的身子骨已經塌了架了。……

我叔临死前拉着我兄弟的手,最后一句話是:“孩子,有

志气,长大了可别当打头的啊……”叔死后,我 孀 家他們娘儿俩,生活更苦了。那年头,孤儿寡姐能干个啥?只好提筐拄棍四出討飯。

明知是火坑也得跳

我叔这一死,我父亲也发狠,說啥再也不叫我們哥俩給地主家替門檻了。可旧社会那个世道,“人穷志短,馬瘦毛长”,咱穷人立志也白搭,肚子不等啊!我哥好歹托人找了个学串花儿的地方。我父亲老了,給財主扛粮口袋上囤梯,腿发顛啦,又被杜家地主一脚踹开了。父亲家来的时候,帶了一身的病,打这以后全家的日子更是吃了上頓愁下頓。

一家五口实在熬不过。我的身子骨比我哥强点,打十三岁起,我就出去給財主家放猪、拉壩去啦。

我十六岁那年,在曹各庄地主李凤岐家当小半活。給他家放猪、做飯外帶掏魚。小雪上工那天,我穿着两只大破毛窝窝,走路不得勁,一走一拐,財主怕我腿有毛病,干不了活,叫我跑跑給他瞅瞅。我怕“考”不上这个“田秀才”,只得脫了毛窝子,光着脚丫片儿在場院的雪地跑了几圈。他看了看,只从鼻子眼里“嗯”了一声就走了。

在李家的累可受大啦!先讲做飯。那年正赶上李家盖房,瓦匠木工三十几口子,我一个人做了长工的大鍋飯,还得赶着給木瓦工单做吃的。开完飯,归置完家伙,又帮泥瓦匠挖土、搬磚、挑水合泥。地主儿媳妇做小鍋飯,我得抱柴、燒火、摘菜、倒泔水、打下手。然后擦桌子、摆家伙。这还不

說。一天到晚还得赶空儿喂养七八口猪。筛猪草, 烩猪食, 垫猪圈, 起猪粪, 全是我一人做的事。地主老爷想吃鱼, 我趁放猪的工夫, 还得给他们掏鱼。有一次放猪, 光顾着掏鱼, 天黑了, 七口猪跑丢了六口, 我蹚着刺骨的河水找了大半夜, 才找回五口来。回家老地主二话没说, 就给了我一脚片子, 打了几个大耳光, 打得我眼前直冒金星。那次, 幸亏我掏了三十多斤鱼, 又托人哀求了半天, 这场大祸才算过去了。那时候, 李家的谱儿可大啦。他们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 懒得活像头肥猪。可是扛活的抽袋烟工夫也不让闲。早晨, 他还在被窝里躺着, 长工一天的活就吩咐好了。有一次, 天刚蒙蒙亮, 地主李凤岐就喊我去找刘宝田串谷。我穿衣服的工夫稍大了一点, 一进门他就甩了我两鞋底子, 还骂道: “我当你死在炕上啦!” 地主阶级对咱们穷人就是这么“王道”。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 在财主家做这么多这么重的活, 可真够劲! 要是这工夫, 十六岁的孩子, 有的正在上中学, 就是参加农业生产, 也决不会受那份累。受累不算, 你当那阵儿挣多少钱? 一年才挣两老石棒子。

禍不單行

天下老鴉一般黑。解放前那陣儿哪家財主的心都是黑的。父亲被杜家地主打发家来后, 气喘、咳嗽、吐血, 没钱医治, 五十多岁就被劳累死了。

那个世道, 穷人活着没有活路, 死也死不起啊! 母亲不

忍心把父亲用高粱秸卷出来，托人舍脸，好歹借了点钱，买了口小薄板棺材，把父亲埋葬了。

在我父亲死的前几年，我哥因为学徒挣不了钱，也回来给财主当小半活。父亲这一死，全家的重担都压在我们哥俩的身上了。哥那年二十一岁，比我大五岁，比我懂事。父亲死后落下的饥荒，愁得他整天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父亲一入土，他就回到地主家做活去了。

我哥起小身子骨就单薄，穷人家的孩子，能养活就是天照看了。哥回到地主家里，正赶上秋天从地里往家里归置柴禾，地主让我哥哥跟车装秫秸。秋天风大，顶着风往车上装，可真够劲。再加上财主家的车马硬朗，赶得快，哥哥累得直喘气，紧追快追也追不上，追不上财主就骂。两只胳膊都累肿了，肿了也得干去，不干，家里人吃什么？父亲死后欠下的亏空又咋办？白天这样干不说，夜晚财主还让长工们打夜班给剥棒子皮。他怕下雨捂烂了，生了芽儿，说剥一夜给五个大子。我哥把心一横：咬咬牙干吧，好歹有五个大子好挣，穷扛活的，哪里惜得筋骨皮肉！就这样白天黑夜地连着干，可怜哥哥小小的年纪，要强的心，干了没几天，就拉血病倒了。

母亲瞧着我哥病成那个样子，伤心得直哭，说：“干不该，万不该，不该不听你爹的话，硬往财主家的火坑里跳。你要有个好歹，我可怎么活啊？”哥哥伸出煞白的手，给妈擦着眼泪，有气无力地安慰我妈妈说：“不要紧，过几天就好了，……”说着说着就晕过去了。

要是这陣儿，誰有个头疼脑热，就請大夫打針吃藥，鬧肚子有这个“素”那个“素”的，吃点准好。可那陣子咱穷人哪来的錢呀，哥哥的病，眼瞧着越来越重，人拉血拉得已經不成样子啦！最后，連說句話的气力全沒啦，只見他脑袋往枕边一歪，就再也不动弹了，只是眼窝里还含着顆豆粒大的泪珠子。

这可真叫“禍不单行”啊！我父亲剛入土一个月，哥哥又追了去。我和母亲呼天喊地，真是“喊天天不答，叫地地不应”。我們赵家三輩，老老少少都給地主扛活累死了。穷人呀，啥年头才能不再当牛做馬！穷人这笔血汗債，啥时候才能討回来啊！

被迫走三輩走过的老路

尽管母亲一千个不願意，一万个不放心，咱也得卷起鋪盖卷，走我爷我爹我哥的路儿，去繼續当长工。那年头，穷人不扛活，有啥活路？有人說給地主当飯把能多掙几斗棒子。好吧，干吧，家里还有我母亲和妹妹等着吃飯呐。

提起当飯把来，直到如今我的头还发炸。想起那年头受的那份苦累，今天再苦再累也比不过。那年我在康家当飯把。我只說說一天干的活，您就明白了。那陣儿名义上是飯把只管做飯，其实干的活可杂性啦。麦秋时一天四頓飯。半夜十一点就叫“五更”，两点钟起来做飯，四点钟长工进門吃飯。开完飯，归置完家伙，赶紧挑水，煮猪食，喂肥猪。喂完了猪，挑人吃的水，起牲口棚、篩牲口草，准备飲牲口水。

这些活都干完了，刚想坐下来抽袋烟，地主来喊了：“飯把，起来！把車道鋪上！”一鋪就是一个多钟头。然后扔下杈子赶紧做中午飯。开完午飯，刚要刷鍋，归置家伙，地主又来喊啦：“飯把，呆会儿再归置，到場院里揚一会場去！”一揚又是一两个钟头。赶上順風还好，風不順，十个手指磨得尽是大血泡。揚完場，到地里送水；送完水地主怕我回来耽誤工夫，就不让回家，直奔菜园去澆园子。



那工夫起五更做飯最不易，沒有钟沒有表，全凭看亮星。天一阴可就苦了。再累，半夜醒来也不敢睡。飯做早了，怕穷伙伴們吃着凉；做晚了，耽誤了工夫，地主張口就罵，举手就打。有一次給地主老爷摘扁豆，实在困得沒法，就自个含口凉水，揚起脖子往臉上噴，清醒一点；过了一会还不行，又拿起扁担到井台挑几挑水，叫風吹着凉快凉快。

那陣兒，你再困，地主家那一大羅傢伙，也得細細地刷洗干淨；你再忙，也得給地主兒媳婦燒火、摘菜，給他們全家燒開水、燒洗臉水。說來您可能不信，那年頭當飯把，忙得不但連抽袋煙的空兒都沒有，有時候就連飯也吃不上。我都是一邊做一邊趕空吃點。您想，長工干活，你做飯；長工吃飯，你喂豬；長工吃完了，你歸置傢伙；傢伙還沒歸置完，又叫你干別的去，你哪里摸工夫吃口飽飯？

可也罷，那工夫莫說當飯把的累，扛長活的也不松快。就說鋤地吧，地主康二癩子常說：“一天四畝多地五畝地就行啦，不要多！”拔麥，天一亮，一個人三畝半地的麥子拔完了。耨地，一盤耨一天二三十畝，地主家的牲口硬朗，兩條腿的老得追着四條腿的跑！咱們這工夫干活，有这么緊嗎？所以我開頭才說：這工夫干活不累，這會兒您該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這工夫在隊上干活，甭說不太累，就是累點，也是給咱自个兒干的，給咱集體干的，給建設咱社會主義新農村干的！

這會兒，共產黨和毛主席叫咱窮人翻了身，當了家作了主。想想過去，比比現在，咱可是不能好了瘡疤忘了疼，忘本啊！憶苦思甜，再望望將來，咱真是打心眼里往外樂，一樂，干活時候的什麼累呀、苦呀都忘了，只覺得渾身涌出一股子用不完的勁頭兒來，越干越起勁，咱就忘了歇工啦！

（李世凱記）

仇恨的烙印

——一个贫农家庭的血泪史

我叫張永江，是朝阳区楼梓庄公社的社員，一九三八年生的，今年二十四岁。按說我在旧社会生活过的時間不算太长——十年。但是，这十年留給我的却是充滿了仇恨和痛苦的記憶。

好年景穷人也活不下去

記得在我五岁（一九四三年）的时候，父亲正在北京拉洋車。已經有四五六岁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整年整月在風里雨里奔跑，身子骨被折磨得越来越弱，拉洋車跑不动，常常一天拉不上几个坐車的主儿，連交車租的錢都掙不出来，沒法子，就又想着回家种地。当初因为年头不好，在乡下生活不下去，父亲才不得不把家里仅有的二亩地卖掉，出来拉車的。現在連土地都沒有了。再回来种地，能有什么好結果呢！当母亲問他，这怎么能活得下去的时候，他苦笑着說：“老天爷总得睜睜眼，还能一点公道都沒

有？城里沒咱的活路，不回乡下怎么办？只好先种着試試唄！”

那年，我們租了本村大地主杜文华的五亩地，我們家里五口人，光靠租种这五亩地沒法生活，就叫我哥哥給人家放羊。我母亲背着我两岁的兄弟、带着我去要飯，母亲要飯回来，还得在家里、地里干点零活。

赶上那年年头不錯，我們在那五亩地上种的高粱，辛苦了一年，收了近一千斤。我父亲平时总是蔫蔫地低着头，两眼直呆呆地发愣。收粮食那两天，变得特別高兴，話多了，眼神灵了，手脚也利索了。收、割、拉、打，趁着好天，紧着忙活，算把粮食弄到家了。我們一家人也都挺高兴，指望着打了租子，能混个半飽，遇上个坏天儿，或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也不用出去要飯了。

收了粮食的第四天头上，我們剛要飯回来，在炕上歇着。只听见“嘯”地一声，門給踹开了。伪大乡自卫队的馮連貴等人先后走进来。后头跟着的是王殿臣，这王殿臣是本村的一个地主，担任伪大乡的乡长，兼作“自卫队”队长。就因为他素日对待老百姓特別狠毒凶恶，老百姓都說他六亲不认，再加上他人长得挺胖，都管他叫“大白臉”。他这“自卫队”是地主阶级豢养的武装，名义上是地主凑錢雇的，实际上这笔花銷都摊在老百姓身上。他們是地主阶级的一班看家狗，到收粮食的时候，給地主收租；地面上有个風吹草动的，就給地主守崗楼；閑着的时候，他們也不干好事，侮辱妇女、喝酒、要錢、挖坟头无所不为。更可恶的是，他們还給駐

在附近的日本电台里的一四一八特务部队的特务高桥送情报。他们一向行凶作恶，欺压老百姓谁不知道！这一天他们来到我家，把我们全家都吓愣了。馮連貴一进门就说：“打租子来了。”五亩地的租子，该打两石，按说灌上两麻袋只多不少。谁知他们哇哇地连灌了五六口袋，只剩了个囤底。我母亲跪在地上说好话，王殿臣把她一脚踢倒，甩手就跑了。我父亲赶紧过去把母亲扶起，一家人忍不住哭起来。上千斤粮食，我们一年的辛苦和指望，像一阵风似的消逝了，留下的只是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的屈辱和痛苦。我父亲还说，老天爷总得睁眼。其实哪有一点公道呢！这就是我们辛苦一年的下场。不但冬天得去要饭，就是刚收过秋，都过不了。

讨饭的苦日子

到如今，想起冬天要饭的生活，我心里还打哆嗦。我们没穿的，裹着烂布片，披着麻袋片。河里已经冻冰了，老北风呼呼地刮着，冷得透骨。我记得有一回我们一早出去，下着鹅毛大雪，一出门，就是灰蒙蒙白茫茫的一片，远处什么也看不见。越往前走，雪越厚。我们过河的时候，雪已经淹没了踝子骨。我穿的是捡来的破鞋，一走一趔拉，雪灌进去，又踩实了，时不时要用手把它挖出来，手脚冻得生疼，到后来就冻得麻木了。我母亲怕人多了，一起过河踩在冰上出危险，先把我兄弟背过去，再回来领我。我过去的时候，看见我兄弟裹在烂布里，小脸蜡黄，像一个小小的死人一



样，真可怜。媽哭，我也跟着哭。

到了村里，要飯都是找那住瓦房的主儿。那时候住瓦房的，都是地主、富农这些闊主儿。我們在头一家瓦房門口一叫喊，不大会儿，門就开了，騰地放出一条大黃狗。那狗直奔我来，咬得我順腿流血。

我們沒有要着一点东西，却带着滿心的

恼恨和屈辱走回家。母亲怕我冷，冻了伤口，把她的破夹袄給我披上。背着兄弟，抱着我，在雪地里深一脚淺一脚地往回走。大雪复盖着田野和沟壑，这白色的茫茫大地，好像真是沒有我們穷人的路了。

干苦活父亲受重伤

父亲种地的希望再一次破灭了，就又带着哥哥到石泉山炭窑上推炭車。我們还在家要飯。父亲那时十天回家一趟，带着滿身的劳累和滿臉的憔悴，还給我們带回两块豆餅。这豆餅是喂牲口的东西，吃起来像蜡似的。母亲把豆餅

掰开，給我們泡着吃。每当她在掰豆餅的时候，常常一边掰着，一边流眼泪。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一九四五年初，一天傍晚，我正坐在門口，远远地瞧見我哥哥和几个人一块，用門板抬着什么回来了。母亲揭开上边盖的棉袄一看，是父亲！只見他臉色蒼白，閉着眼，无力地說了声：“到家了嗎？”就又不作声了。原来当时日本工头逼着父亲在鐵道口的危險地方干活，在一辆炭車过来时，躲閃不及，給挤到墙上，压昏了。鬼子和資本家不給治，就給扔在那儿，还是工友們帮助弄回来的。父亲在炕上躺了半年多，都不能动弹。

全家被逼住荒坟破屋

日本投降后，我們的生活也并没有比从前好过一点，日本强盗走了，吸血鬼、地头蛇仍旧稳坐江山。王殿臣还是大乡长，馮連貴、程德喜仍旧当狗腿子；只不过旗号换了，“自卫队”改成了“壮丁队”。他們仍旧横行霸道，經常找上門来，欺負老百姓。

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二月里。当时，父亲病刚好一点，勉强能起来出去要飯了。有一天，只听见又是“噹”地一声，門給踹开了。来的又是王殿臣，后头还跟着馮連貴等人。王殿臣手里拿着盒子枪，一进门，就叫我們搬家，說是他們的学校要使用这地方，限我們明天搬走，把房地卖给学校。我父亲不愿意卖，馮連貴就一瞪眼說：“不卖，你打算发外財怎么的？”我父亲說卖了房沒地方住，一家人要飯吃，租房也給

不起房錢。他們就說：“沒地方住，自己想办法。”最后，王殿臣硬讓我們搬到北坟地去住。

这北坟地从前是一家大地主的坟場，周圍有很多树趟子，坟圈里淨是一摞多粗的大松树，一刮風，沙沙一片响，阴森得怕人。坟圈附近有座院落，早先有个叫王車子的人在那儿看坟，后来那家地主敗落了。那年头盗墓的又多，王車子說夜里听见棺材板喀巴巴地响，駭怕，走了，那儿就再没人住。我們平时拾柴禾都不願到那边去。

我們搬到北坟地的时候，那院牆的門是用磚堵着的，現把磚推倒了扒开才进去。一进屋，惊起滿屋的鳥儿，騰楞騰楞，穿过門口和窗櫺飞了出去。到夜晚，狐狸、獾子像狗一样地滿院乱跑，真是荒僻极了。

我們在北坟地住了有五六个月。那时哥哥已經十七八岁了，給人家扛活，我和媽仍旧带着兄弟要飯。父亲在北漪坑种着那二亩累死龙王爷的高崗地，这是王殿臣强迫我們用房子換的。

六月里，一天晚上，已經是半夜了，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有一道亮光晃来晃去，这是手电的光，是誰到我們屋里来了？哥哥捅了我一下，縮进被窝，我心里一惊，直往母亲怀里扎。当时我没听真，好像有人說了几句什么，我父亲就坐起来了，向我們說：“甭害怕，不要紧。”我們也就都起来了。那亮着的手电筒擱在炕边上了，照見了对面的人，我才看清来的是四个穿軍装的人，他們接着我父亲的話头，安慰我們全家人不要害怕，說他們是八路軍，不是来抓兵的，是保护

老百姓的。接着，就問了我父亲家里都有什么人，以什么为生，父亲都說了。又問这儿离国民党二〇八师电台有多远，“壮丁队”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这儿有几个小鋪，“壮丁队”的人是不是常去喝酒。父亲也都照实告訴：离电台十多里，“壮丁队”有四五十人，枪支可能比人数少点，有一挺机枪，庄上有三个小鋪，他們常去喝酒。来的四个同志問完了說声謝謝，还囑咐我父亲，別把他們来的事情告訴別人。父亲說：“您放心，您不囑咐，我們也不能跟別人說。”說完話父亲就穿鞋，要給八路軍带路上电台去。那四个同志坚持着說不用，也不让我父亲送出来，就走了。他們走得那么輕，連出我們的房門都沒听見声响。我們一家人照样坐着，想着剛才的情景，誰也沒有躺下来。父亲点起烟袋，借着那一点閃爍的火光，我看見他用食指和拇指比划着說：“这个，可是好队伍啊！”我們都明白，他意思是指的八路軍。又囑咐我們不能出去乱說，誰也不能告訴。这一切发生得是这么突然，就是在这一会儿工夫里发生的事情，却使我們这个沒有欢笑的家庭充滿了喜悅和希望。

給父亲受苦刑，还要活埋儿子

第二天的傍晚，我正在墙外小杏树底下坐着，忽然見迎面黑压压地一群人走过来，是“壮丁队”来了。这群黑老鸱一来准沒好事，我赶紧跑进去告訴父亲。这时，外面已是人声吵杂，好像四面都給圍上了。我們剛出屋門，看見他們已經在外面土堆上架上机关枪。王殿臣举着盒子枪冲着我父亲

嚷叫：“張振，举起手来，动，打死你。”接着，就說我們私通八路，問我們把八路藏在哪儿。父亲說沒見過，不知道。他們在屋里院里乱翻了一陣，就連推帶搽地把父亲綁走了。

父亲被綁走后。哥哥当晚也沒回来，是不是也給抓起来了，还是躲起来了？母亲担心着父亲，又記挂着哥哥，只是不停地哭泣。那时我虽然只有八九岁，可是已經懂点事了。我常听見人說“壮丁队”爱錢，把人押起来，能找保人，花錢贖。我就跟母亲說：“咱們想法借点粮食借点錢，把爸爸保出来；現在咱們先上街里瞧瞧去。”母亲让我看着兄弟，一个人上街里去了。

母亲回来的时候，只說了句“‘壮丁队’的大門关着，什么也沒瞧見”，就又哭了起来。那晚上我們誰也沒有心緒收拾让“壮丁队”翻得稀烂的屋子，也不願点灯，心里比屋里的情形还要乱。

第二天一早，我們上“壮丁队”那儿去瞧父亲。来到大門口，就瞧見父亲仰天給綁在长凳上，臉上蒙着一块手巾，双脚并攏地捆着，两个胳膊分別捆在两边的板凳腿上。狗腿子程德喜等人手里摆弄着盒子枪，坐在旁边。桌子上擱着胰子、刷子和茶壺。我們要进去，門崗拦着我們說：“干什么？找死来了。”又吓唬我們說：“甭瞧，呆会儿就活埋！”正說着，只听見馮連貴的声音在問：“八路怎么来的？”沒有听到回答，他又接着叫喊：“灌！”只听見我父亲“哎哟”一声，就讓他們拿胰子水咕嘟咕嘟給灌的沒有声息了。馮連貴还罵：“叫你們再曠餓，一天灌三回，让你喝个飽。”我們闖进

去，母亲哭着求他把父亲放了，馮連貴凶狠地把她推出来，还说：“往后少上这儿来，再来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

当时，我觉着我的心都伤疼得麻木了，脑子昏沉沉，简直什么都不知道了。父亲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打我们一懂事，就告诉我们要长志气，人穷，志气不能穷。他硬着骨气，想凭着自己的力气吃饭，却不但吃不饱，还要受这群畜牲的恶治，我那时只有一个最强烈的愿望，要让爸爸活着！

母亲去找保人，我带着兄弟回家。当兄弟睡着了的时候，我走出来，茫然地坐在门口。远远地，馮連貴带着程德喜又来了。一见他们的影儿，不知是由于恐惧，还是由于嫌恶，我心里不由得一颤。他们一来就问我母亲哪儿去了，我说找保人去了。馮連貴就说：“你以为完事了嗎？还早哪！”我一想起他们那么灌我父亲，心里就恨极了，就顶了他一句说：“随你便！”这时，程德喜从我们屋里拿出一把铁铤，捡一个土松的地方，就吭吭地挖起坑来。馮連貴还逼着问我，那晚上来的几个八路，我父亲怎么招待的。我心想，知道，就是不告诉你，就说：“不知道！”馮連貴横眉竖目地一把揪着我脖领子，把我搽到坑边，这时程德喜已经挖了有二尺多深了。馮連貴又逼着问：

“说不说，那晚来的几个八路？拿的什么家伙？”

“不知道！”

“活埋！”

馮連貴一把把我推下坑去，程德喜往坑里“刷”地鏟了一铁铤土，我站在坑里，闻到潮湿的土腥气，感到心在砰砰

地跳动。我握紧拳头，手都抽筋了。父亲再也见不着我了。

“别埋，别埋，把小孩儿拉上来！”

我扭过头顺着声音来的方向望去，见树趟子里走出了两个伪二〇八师的兵，好像事先埋伏好了似的，直奔这边走来。他们到坑边把我拉上来，还拍着我的肩膀说：

“说吧，那天来了几个八路？说了，不活埋，还给好的吃！”

“不知道！”

“不说，活埋你，我可不管。”

我没有吭声。一个兵点起了一支烟卷，摇了摇头。馮連貴说：“你好好想想，明儿来找你算账！”说罢，四个人一块儿走了。他们就是这样企图用软硬并施的办法来向我逼供。我一个人坐在坑边，想着刚才的屈辱，忍不住大声地哭起来。

第五天头上，把父亲保出来了。母亲搀着他进了门，他的脸色像白纸一样，眼睛无力地大睁着，一到炕上就躺下了。叫他们给灌了四天，简直折腾得不像个活人了。一回来，吐的净是胰子水，晚上吐了一宿白沫。喝水，吃东西，一会儿又都吐出来，第二天又吐了一天白沫，第三天就开始吐血便血。直闹腾了五六天，母亲才想办法借到钱请医生给瞧了。正在父亲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的时候，“壮丁队”又来了，他们怕我们和八路军再有联系，就强迫我们搬回街里去。这回是“壮丁队”的副队长杜润，带着馮連貴等一伙人来的。街里没地方住，那时哥哥正在老何家扛活，“壮丁队”就硬让

我哥两年不拿工錢，置老何家的一块地盖房。杜潤临走时，凶神恶煞地說：“限你們三天搬到街里去。”这样，我們又搬回了街里。

父亲病未好，哥哥被抓兵

搬回街里，住了半年多，父亲剛能勉强下地干点活。不幸的事又接着发生了。

有一天傍黑，我正在小桥旁边玩，看見馮連貴、程德喜綁着我哥哥，还有另外两三个人过去了。我赶紧回家告訴父母亲。父亲說：“准是抓了兵了。”就找到“壮丁队”队部去。一进门，王殿臣就装模作样地問：“張振，干嘛来了？”我父亲說来瞧瞧我哥哥。王殿臣阴險地說：“沒事，是让你儿子享福去。”又說：“要不想去，就拿二十石棒子来。”我們一家人靠要飯过日子，哪还拿得出什么粮食来呢！

哥哥被抓去当兵的那天，母亲一路哭着，一直跟到坑沿那儿，眼睜睜地看着他們走了，就坐在那坑沿上哭。后来她告訴我們說，要不是我跟我兄弟还小，她真想一头扎下去。

一九四八年初，越来越近的炮声，給人們带来了解放希望。国民党十三軍的馬队順着河滩跑了，瞧他們跑得多么急，手电、米袋子，丢得一道儿上都是。几家大地主也都跟在他們小老婆的轎車子后面，騎着馬往北京逃了。“壮丁队”头天还在装模作样地挖战壕，第二天也把队部的大门上了鎖，沒影儿了。这时候，没人来欺負我們，但是，一家人却都在为哥哥当炮灰的命运操心。

苦尽甜来，不要忘记过去

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的一个清早，一家人正在愁悶地喝着湯湯水水的稀粥。忽听得屋外一陣脚步声。我从破窗紙里望出去，两个穿草綠色軍裝的人，挂着冲鋒枪，戴着大皮帽，臉儿紅紅地，显得特別威武。我再一細看，前面的一个，有一双烏黑有神的大眼睛，啊！不正是哥哥嗎！

“媽，哥回来了！”我快活地叫起来。我父亲說：“不可能。”正說着，哥哥已經跟另一个同志进来了。母亲这时正拿着一个空碗預备盛粥，一見了哥哥，扔下碗，就扶着他哭起来了。哥哥也含着眼泪說：“我这不是当了解放軍回来了嗎！”接着，他就告訴了我們，他被抓走不久，就在張家口被

我軍解放过来，成为一个人民解放軍的战士了。一家人重聚，說不出的欢喜，我們的苦日子终于熬出头来了。

解放后，国家帮助我进了小学，又培养我到包鋼工业学校去学习專門的知識和技术。我們的国家，我們的社會，是多么好啊！我一个过去討飯的孩子，如今却能享受到学习和工作的幸福。我一定要使出自己所有的力气，把我們的国家建



設得更好。我們在包頭學習的時候，真是眼看着自己的鋼鐵工業往上長，今天還是一塊地基，明天就築起一圍高牆，今天還是一段矮矮的煙囪，明天就已經高高地砌起了，冒煙了。我們心里多么着急，恨不得快到工作崗位上去，給我們的社會主義鋼鐵大廈添一鏟泥，砌一塊磚！當我們畢業了，揹上了裝着電工的三件寶（鉗子、改錐、電工刀）的皮套，我們是多么高興啊！我們將要親手去接通稱量車的電路，讓它為我們的高爐運送糧食——焦炭、生鐵礦、石灰石。我們站在高空鐵架上安接着高壓綫，嚴格的技术要求和滿心的喜悅，鼓舞着我們高質量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一九六二年，為了支援農業戰綫，我由包鋼下放回鄉。一進村，遠遠地就瞧見新建的畜牧場，一排排的白頂紅房。高壓綫的電杆有秩序地樹立着，電綫的弧垂十分均稱整齊，電綫像蜘蛛網一樣通向四鄉。那是新建的學校，大概剛剛下課，許多帶紅領巾的孩子在操場上歡樂地追逐着。我的家鄉，它的變化是多大啊！喜悅的眼淚止不住流出來了。

可憐，我父親被舊社會折磨得太苦，解放後不久就去世了。沒有能看到今天的好日子。如今，我哥哥從部隊復員回家，我兄弟當了人民解放軍的戰士；我和哥哥都成了家，都在社里勞動，快樂地生活着。我母親看着今天的好光景，再也不流淚了。如今，我們樓梓庄再也沒有人要飯了。飢餓、貧困和屈辱的日子再也不會回來。我們的社員在充滿信心地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勞動。舊時代，已經過去了，但它給我們一家人的折磨，却在我心上留下了重重的陰影，深深地

烙下了一个印迹。这个印迹，使我对童年的记忆充满了仇恨和痛苦；这印迹，也时时在激励着我，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献身劳动和工作，为我们的今天，为我们的未来，为我们的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李淑华 记）

苦 根 儿

——小鉄梁流浪記

咱打小就是苦根上长的苗儿。解放前，人們都管我叫“小鉄梁”，一提这名字，就有一大串事涌上心来。

沒錢沒糧，哪儿有立脚的地方

我們家原先住在通州城，全家人就靠父亲給人做飯来維持生活，他的收入又沒个准儿，人家爱給多少就拿多少。家里人口一年年加多，还是死啃那点儿收入，也只能混个半飽。可是，沒过多久，連这样的日子也保不住了。

那是芦沟桥事变以后，鬼子进了城。父亲做飯的那个地方，也給日本人占領了，鬼子一打量我父亲，看他年紀大（那陣他已五十多岁），身体像有病似的，就把他赶了出来。父亲失业了。开初，父亲把家里的罈罈罐罐卖掉，弄了点本錢，端着个木盘，在街上卖蚕豆、瓜子。可是，这又怎么养活得了一家六口呢！沒过几天，就連本儿也吃光了。

做生意这条路堵死了以后，一連几天，父亲总往外跑，有一天晚上，外边正刮着西北風，家里沒有一顆米粒儿，我

們都餓得嗚嗚地哭。不一會兒，門吱呀一聲響，父親回來了。我們心里不由得一陣高興，就撲到他的面前，可是他什麼也沒帶回來，只是拉着我們一塊坐到母親的身邊。他臉色像蠟一樣黃，好幾次抬起頭，想說什麼，又耷拉下了腦袋。呆了好一會兒，他才猛然抬起頭來說：“小鐵他媽！我捉摸過了，這麼下去全家都要餓死，還是各人找一條活路吧！”母親說：“你這是什麼話啊？”父親好像沒聽見她的話，還是繼續說：“我都托人說好了，你給人哄孩子去；兩個大孩子送進戲園；兩個小的讓人抱去。我，隨便……”母親打斷他說：“不行啊！孩子他爹，咱死也死在一塊！”由於母親阻攔，這個家才沒有散。

家是保全下來了，可是生活怎麼辦呢？通州是呆不下去了，第二天一大早，父親就把家里賣剩的破棉被、爛衣裳，歸置了一小担，挑在肩上，叫母親背着妹妹領着我和哥哥，走上茫茫的田野，開始了第一次游蕩。那還是二月天，地裏沒有開凍，風吹得刺骨的冷，肚裏又餓，走起來真費勁。天黑的時候，我們才走到棲梓莊。父親托一個親戚，借了北墳地黃家的一間屋子，暫時住下。可是，沒出一個月，因為孩子打架，被黃家趕了出來。過後，父親又央人說情，搬到北馬房畢家墳地去，兩家擠在一間屋子裏。在這兒剛住滿半年，又出事了：那年的大秋，我們每天討過飯就上地裏揀糧食，好不容易積存了一些糧食。有一天，給地主家看青的瞅見了，當天傍晚，冷丁闖進來兩個人，手里拿着木棍、繩子，怒氣沖沖地對我們說：“你們家哪兒來的糧食？准是偷



来的，走！上保公所讲理去！”一边骂着，一边就把父亲绑走了。保公所在大庙里，那时的大庙，就像阎王殿一样，哪里还有穷人讲理的地方？父亲给绑进去，就被他们使大木棍打得死去活来。就在这工夫，又冲进来两个人，把我们家的铁锅也抢走了。这一夜，母亲一直在擦着眼泪，我们坐在炕上，眼巴巴地望着窗外。大约是半夜了吧，才听见一个人“哎哟，哎哟”地哼着慢慢走进屋子来：是父亲回来了！我们都高兴得喊出声来。可是，看见他身上那青一块红一块的伤痕，禁不住都哭了起来。父亲告诉我们说，是罚了一斗五升粮才放他回来的。不用说，这里又呆不下去了，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撵我们搬家。没辙，只得搬到雷庄的一家店里住，每月得交房租。开始，靠我父亲去给人唱唱喜歌，挣来几个钱，还凑合住着。可是后来附近好长时间都没有碰

上紅白喜事，父親掙不來錢，交不上房租，房東又把我們撵了出來。離開雷莊，我們向東窑走來。

一到東窑，正遇上地主王萬川家找人看園子，我們便住了他們家的園子房。那是一間小土屋，伸手都能摸得着頂兒，我們便鋪上點兒干草，就在那里落了家。這是一九三九年的秋天，那時候的東窑是一個窮窩窩。這裡的地主，跟樓梓莊一樣黑心眼，住了不過一年多，麻煩又來了：因為有個本家叔叔晚上常來跟父親學唱喜歌，給地主家打更的看見了，就疑神疑鬼告訴了地主。第二天，王萬川就叫他母親到咱家又哭又嚷，說我們招了土匪，要撵我們走。給她嚷得沒辦法，父親就上尹各莊去找房子去了。這樣也絲毫沒有緩下那地主婆的氣，沒等我父親回來，她就吆喝幾個做活的，叮叮當當一下就把我們家的東西給扔了出來，还用土坯把小窗戶也給堵上了。不一會兒，父親回來了，看着空地里的一堆破爛家具雜物，直愣了半晌，想不出一點兒辦法來。後來，還是窮哥向着窮哥，莊上有一個要飯的伙伴，千方百計把咱們說到劉德貴家去住。

好收成，換來災禍一身

這劉家，也是個有錢有地的人家，可咱們住他的房也不是白住，平常給他們干活，從來沒拿過他一個子兒。在劉家，開始也是靠要飯、揀糧食，東混西混，糠糠菜菜糊着個嘴。可是後來，要飯實在不好要，父親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不忍痛把妹妹給了黎各莊，得了幾塊錢，他拿着這錢，

就像捏着自己的心头肉一样，一个也没敢花，就拿去交了地租。这样，我们就种上了刘家的四亩地。种地，那年头也是很不容易的，先交租粮不算，还得有保人。我们每天起得老早就出去拣粪积肥，早上要饭回来，就去耨地耨草，有时天黑了也还泡在地里。可真巧，这年是个好年成，那棒子长得老长一个。全家人辛苦了几个月，把粮食打回家来，除了交各种捐粮之外，还剩下六七百斤。我父亲正合计着拿一部分去交下一年的租粮，希望再有一个好收成，免得去讨饭。可是，一场横祸又来了。粮食打回以后不几天，一个大清早，我们还没吃饭，猛地冲进来三个人，手里拿着五尺长的大马棒。这些人是给王家地主看青的“棍头”，那为头的怒气冲冲，劈头就嚷：“王家丢粮食了，你们家的这些个粮食，准是偷来的！”这粮食明明是咱家自个儿打的，庄上的人都知道，凭什么说我们偷？父亲一听，气得发抖，就顶了他一句：“你们这不是诬赖人？”他们听了这话，上来梆梆梆几棍就把父亲打倒在地上，我们兄弟几个吓得直哭。母亲跟他们说好话，不济事，又跑出去找人来劝说，可是，没等她回来，父亲已经被他们押走了……。没过半天工夫，又有几个人套着牲口，拉着大车冲到咱家，一阵抢夺，就把咱家的粮食弄走了，一颗粒儿也不剩。

一连好几天，母亲到处奔跑，央人去保父亲。那阵人家只认得钱，没有钱也是白跑。第六天傍黑，父亲回来了，他的脸色黄惨惨的，满脸满身都是血印和青块块。原来那帮狗腿子把父亲押到金龛的大庙里去了，还没有进殿，就被他

們用繩子吊在房檐下打了一通，然後逼口供，問他糧食是不是偷來的。父親一口咬定沒有偷，他的答話一落，幾個大漢又把他按下，跪在磚地上，後邊膝蓋窩里擱上一根碗口大的木杠，杠的兩頭各一個人。逼供的問：“糧食是不是偷來的？”父親說：“不是。”接着那人叫一聲“壓！”，那兩個人就踩上木杠，壓得我父親疼昏過去好幾次，然後他們燒鋸末把他熏醒過來。儘管這樣，父親还是不承認。他們又把父親綁在柱子上，使勁灌涼水，灌得他又昏死過去幾次……。

我們兄弟幾個听了父親說這段受刑的經過都攥着拳頭哭，那涼水就像灌進了我們的肚里，噙進我們的肺里一樣，那木杠就像壓在我們的腿上一樣，我恨不得立刻就去報這個仇！可是咱那陣拿什麼去報？要錢沒錢，要勢沒勢。過不了幾天，人家照樣又把我們從劉家攆了出來。

到处流蕩，滿地為鋪

一九四二年晚秋，我們走出了劉家，東窰就再也沒有咱落腳的地方。一天早晨，父親又挑起了那一小担破爛，領着全家開始了第二次的游蕩。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天，整整有一年多的時間，我們沒睡過一次暖炕，沒吃過一頓熱飯。我們住過的地方，實在沒法數：西趙、平灘、寨里、東坟、楊各庄、牛山、河南、河北、北河、王家場、吳庄……這些村的廟都住遍了。有的廟還能遮個雨擋個風的，有的沒門沒窗，一到半夜，老北風刮進來，全家五口子就蓋那一床爛棉被，哪里擋得住，凍得壓根兒也沒法睡，只得燒火烤到天亮。有一回

在西赵，連庙也沒住上。那天，我們討飯回来很晚，往庙里一看，到处都睡滿了人，連脚都插不进去，只好在附近一家有錢人的墙根下呆了一夜。这地方是一个斜坡，身子躺不平，腿也伸不直，半倚半靠地熬了一个晚上，根本沒法睡着。可是第二天一早，还得照样去要飯。唉！提起那要飯的日子，現在都觉得心寒！

我母亲提着小鉄桶，拄根枣木棍，有气无力地在雪地里走；我穿着破麻袋、烂布片凑成的袄子，跟在后边。穿的鞋是拣来的，又大又破，沒走几步又掉在雪堆里。那脚肿得像个紅萝卜，脚丫底还裂着口子，走起来可疼了。那年头要飯的太多，給的沒几家，常常在人家門口站老半天，睬也沒人睬，只得又到別家去。这还算便宜了你，有的人家，他不給不算，还放出几条狗咬你两口。

一九四三年夏天，有一天傍晚，我們走到葛渠村的一个地主家去要飯。那真是有錢人家，养了特別多的狗，我們剛进院子，就扑上来一条大青狗，一下叨住了我的膝盖，我疼得倒在地上……那血热呼呼地順着腿直淌，走一步有一个血印留在那个院子里。回来养了一个多月还在流黃水。后来右膝盖两边还留下两个很深的狗牙痕。有一次，我母亲也給咬得挺凶的。那天前半晌，我們走到离咱住的破庙有十几里地的康沿村，一进村，看見有几幢大瓦房，我們便过去要，接到一小疙瘩棒子餅之后，剛往后轉，就冲上来一条大狗，一下啃住了母亲的脚后跟，往回一拖，我母亲啪地一下就蹶倒了。我过去扶她的时候，已經流了好些血，跟着就紅

肿起来。我們只好餓着肚子帶着傷，一拐一拐艱難地往回走。

這是咬得比較厲害的兩次。要說給撕破襖子，磕破一點皮，那就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天地這麼大，可就沒有咱窮人安身的地方，在外方流落了一年多也沒尋着路子，只得又回到東窰來，住在村南的小廟里。到了冬天，那就遭孽了，常常因為風大雪深出不去，全家就呆在廟里挨餓。有一回，地里下了一尺多深的雪，一連七八天的時間，肚里也沒進一顆糧食，父親、母親和我，冒着風雪就到地里，去扒拉雪堆，找一點爛菜幫、野菜什么的，拿回來攪鍋里一咕嘟就吃。那年冬天差點沒餓死。

在這小廟里住了整整八個月，後來，托人說情，又回到王萬川家看園子，可是沒多長時間，王家丟了菜，說我們沒看好園子，就又把我們趕了出來。

石景山干活，冤多苦多

咱窮是窮，打小時候起，就有那麼點兒倔勁兒。那陣總以為，不會干活才落得沒吃沒穿的，要是長大了，能給人扛活，日子會好起來的。所以打一過十歲，就合算着去找個主扛活。我哥哥十三歲就上高辛庄給人當半活。打那以後，我更不願呆在家里要飯。有一天機會來了，那是一九四四年春季，一天上午，父親他們出去要飯沒回來，我跟弟弟看家。不一會兒，有一個姓童的大漢走進來，他說石景山日本人開的鐵廠，正在收工人。那兒的活計不重，吃得飽，

还能挣大钱。我想，反正在家要饭，也没有什么奔头，上那儿还能挣几个钱来养活父母，就听信了他的话。当天下午，那人来了，我提起个小包，连父亲也没见一面就走了。村上一块去的，还有傻李二。傍黑的时候到了石景山，姓童的领着我們，走进一座两边有兵守着的大门。到了工地上，他跟那工头嘟囔了一阵，伸手接了一个小包，就走了。后来我們才知道，原来他把我們給卖了。

在石景山的一个月，真像牲口一样。吃的都是又苦又辣的“共和面”，揣满牲口毛的窝窝头，一啃直刺嘴，比药还难吃。住的是旧砖窑。我那陣穿的还是那件麻袋片破布片拼凑成的棉衣，底下穿的是一双拣来的破鞋，其实穿不住，是我用铁丝把它纏在脚上的，脚上都勒出了很深的痕子。可是有的伙伴更苦，连棉衣、鞋都没有，有的连裤子都是洋灰袋纸缀成的。干活的时候，你抬头一看，那一长溜人，个个脸上髒得发黑，头发长得像刺猬。

干的活是抬煤，从火车站抬到大鍋炉下边。工人一天两班倒，我們是夜班，从晚上八点頂到第二天早晨，到半夜困得站着都能睡觉。有一个十几岁的小伙伴因为打瞌睡，一下扑倒在火堆上，燒得浑身都是水泡，人家給抬走时，已經半死不活了。干活的时候，日本鬼子穿着軍装，拿着几尺长的棍子監視着，要是抬煤抬慢了，抬少了，打瞌睡了，那棍就朝你身上打过来。給他們打得起不了炕，打死的人不在少数。那种折磨，就是身子骨再棒也頂不住哇。

沒过几天，我就病倒了，害的是血汗病，吃不下飯，发

燒，說胡話。住在一個舊磚窰里。這窰有六七丈長，打兩行地炕，睡五十多個人，冷天也不生火，門上只掛張草帘，連風也擋不住。我躺上幾天涼炕，病就更重了。這下可危險了，因為在窰的外邊還有一個破席棚，是專門給重病號住的，那裏頭更冷。有個鄉親熟人，給送個飯端碗水還好些，要是沒有，那就活活給餓死、渴死，有不少人就是死在那席棚裏的。一死，他們就攆到壕溝里或滿地亂扔，在我們下工回窰走的那段路上，一邁腿就會踩着死屍。跟我一塊去的傻李二就死在那裏了，連屍也沒找着。我也想過：逃走行不行？但那是一條死路，那廠子四周圍着兩層鐵絲網，一層電網，哪兒也出不去，要是給抓住，就只有死。有一個小伙伴因為受不了折磨，跑了出去，後來給抓回來，二話不說，就把他活活地攆死了。這麼一想，好像再也活不成了：一想起我爹和我媽，想起弟弟和哥哥，眼淚就嘩嘩直掉。爹啊，你快來救救我吧！

可真幸運，大約過了沒到一個月，鬼子快要把我抬去席棚的那陣，父親趕來了。那天太陽剛落，窰里已經看不清人影了，我還是躺在冷炕上哼哼，冷丁聽見一個人叫道：“小鉄！小鉄……”我聽出了這是父親的嗓門，就大聲喊了一聲：“爹！我在這兒。”爹兒兩個合計了一陣，他就背着我往外走，手里拿着一個碗，走到大門的時候，門崗問我們干嗎去，父親就說買咸菜去。

出了那個鬼門，我們就奔家里來了。

後來才知道，父親去救我是費盡了周折的。他聽說我

被卖了，就上石景山，一边干零活，一边找我，当时还把錢积下来准备拿去贖我。那天，进鉄厂以前，他还在山上找了大半天，傍晚才找到我住的地方。就为我离开那个鬼地方，父亲也受了不少罪。

回家以后，我的病慢慢儿好起来了，可是沒想，我这一回来，却給全家都招上了病。有一陣，我刚能起来上外边要飯，家里却全都躺倒了，我母亲几天不能吃一点东西，尽喝水，有一天，整整喝了七小盆。这一病，全家几乎都送了命。

含冤受屈，四年不見天日

病好以后，我还是在家呆不住，就央人作保，上楼梓庄大地主康二孺子家放猪。这是一九四四年春季的事情。

在康家四年，受了四年活罪。那活計多得現在想起来还怕人。每天天沒亮，康二孺子还在炕上打鼾的时候，我就得起来，濫猪食，喂猪，挑泔水，扫院，放猪，煮猪食，掏鸡粪，起猪圈儿……光挑水，一天就得挑十多担，外加几十口猪的泔水、猪食和澆花水。我那陣才十三岁，比盛猪食的水缸也高不了多少，那副木水筒又大又沉，常常压得走不稳，連人带桶蹶倒在地上，有一次把桶梁摔折了，回来給孺子打了一頓。平时，每天都得忙到半夜才能完活。要是母猪下崽，就得通宿守在猪圈旁边。遇上冬天，我还是那一件破棉袄，連肚脐也盖不住，大北風带着雪片刮过来，冷得牙齿直打顫。就这样也得把猪看好，可不能让母猪压坏小猪，要不又得挨棍子。



这康二家是楼梓庄有名的刻薄鬼。在他们家，咱天天吃的都是虫蛀了的陈小米加咸菜疙瘩。他们家种着一个大菜园，可是咱们只能吃上点残菜叶，老菜帮。这犊子可真奸，管粮食管钱财，就像死人捏鸡蛋一样，没个放的时候，对长工还克的这么紧，外边要来个要饭的，就甭想由他们家拿走一小块窝窝头。有一天庄上沈永珍他妈来要饭，刚到门口一站，康家不给，还放出好些个狗，一下把人家咬跑了。要饭的苦，我可是吃过不少，一看见她连走道都困难的样子，

真觉得可怜，就顾不得康家的规矩，给了她半块棒子饼。这事儿，后来给瘸子知道了。傍晚，我正在喂猪，他气鼓鼓地一瘸一拐地走来，那牛眼瞪得老大，冲着我就骂开了：“我日你小姥姥的！你拿我的粮食去送人呐？”那肥胖的大手，一下掐住我的脖子，拖到院子里就打。还有一次，宰猪的时候，拣了点猪毛也挨了顿打。按惯例，猪毛是给放猪娃的，我当时想，好不容易把猪喂大了，吃不上猪肉，拣一点猪毛去卖总可以吧。可是，这事给瘸子知道，就呲着黄牙，举起拐棍，从东院打到西院，又从西院追到东院，那次挨了他不少棍子，腰骨疼了好久。

在康二瘸子家挨打的次数，数都数不清。瘸子手里整天拿着拐棍，有时拿一条大鞭子，什么事情一不合他的意，就得挨他打。早晨起床晚了，挨打；行动慢了，挨打；猪病鸡病，挨打……不单挨瘸子的打骂，动不动还得挨他儿媳妇的打骂。

在康家干了四年，给他们家挣的钱粮真不少，那时常年都给他放着几十头猪，要以每头猪卖五石棒子算，一年也有好几百石棒子的收入，还不算几窝母猪下的崽。可是，给咱的工钱，你知道多少？头一年才给一石二斗，第二年给二石多。我哥哥在高辛庄扛活，挣的工钱也跟我挣的差不多。两个人在外边卖命干，父母亲还是吃不上穿不上。直到解放，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壠。那世道真是没咱穷人的活路。

* * *

要說咱穷人真正有个奔头，那还是解放以后的事情。解放不久，我就到磚厂里去当工人，后来又到一个学院里做飯。我每次从城里回来，总觉得咱这地方，再也不是从前那样的穷窝窝了。你看，河边上安起了老粗的水泵，一按电門，那白花花的水直往地里流去，庄稼收成比起早时，好得多啦；河坡上还种起了稻子，連咱这样的人家也吃上了大米。解放以先，誰知道有这个光景？我們兄弟仨都結了婚，家里啥也不缺。旧社会一个臭打活的，現在也戴上了手表……嘿，这生活才真叫紅哩！

(莫文珍 記)

半斤杏子

——貧农沈永珍的一段家史

(一)

年年一到杏子熟了,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

十八年前,我才十七岁,在大地主康家当小半活。一天前半晌,我正忙着温猪食,我大孀来找我了。我心里有点纳闷,来康家三年了,还没个亲戚朋友找我呢,大孀干什么来了?活忙得正紧,我和大孀打声招呼,又忙着干活去了。

我喂完了几十头猪,又把几十只鸡也安排停当了。这时,车把式赶着一大车麦个子来了,我又忙着去卸麦个子,车卸完了,又把车上拴着的驴解下来,牵进了牲口棚。大孀子这才跟着走进牲口棚,看起来她好像有满肚子心事,是不是我妈托大孀子来找我要钱?我来了三年,我妈还没向我要过一个子儿。来康家的时候,说好是一石五斗棒子一年,不知地主怎么七折八扣地打算盘,三年,我总共只拿过六斗棒子。上次送回去,我妈还舍不得吃,一定要留着给我买鞋穿。唉!大孀一来,把我的心都搅得七上八下,我那讨饭的

媽不知怎么了？

“二騷子！”大嬸叫着我的小名兒，“你吃過晌午飯了嗎？”

我當是她要同我說什麼事兒呢，這一問倒放心了。

“沒呢，”我餓得很厲害，頭天半夜三更起床拔麥子，早晨吃了一頓稀的，一直干重活，沒有油水的肚子早在咕咕地叫喚了。

“那你先吃吧！吃飽了再說，我沒啥要緊的。”大嬸子說。我心想這太好了，沒啥要緊的，我就對大嬸說：“那您待會兒，我吃飯去。”

我不敢把大嬸帶到院子裏，康家地主規矩嚴，扛活的是不許親戚朋友來往的。我找了一塊木頭給大嬸當凳子，讓她在牲口棚裏歇着。等我吃完了飯，大嬸才告訴我說：“二騷子！快家去一趟吧！你媽病得不輕啊！”

“您怎麼不早說？”我嘴裏是這麼說，可心里也明白，大嬸子看我又餓又累，怕早說了，我吃不下飯，那年頭，扛活的，給人當牛當馬，就為的是混一天三頓飯啊！

也不知是哪來的勇氣，我一口气就跑去向東家請假。端人家的碗，要看人家的臉色，請假可不是容易事，扣工錢不說，說不定今天去請假，明天就歇你的工。來康家三年，這還是第一次請假。我至今還記得那有錢主兒的一副鐵板板的冷臉，他愛理不理地說：

“那……半天就得回來。”

我二話沒敢說就和大嬸筆直奔家里跑去。

(二)

如今，咱們要是提起誰有個家，沒有什麼稀奇的，誰還會沒個家呢！可那陣，我這個家，提起來真叫人心都寒！一間小破土屋，半邊屋檐都塌了，房子里只有一个小土炕，炕上連張炕席也沒有，一家人誰也沒有蓋過被子，也沒誰想過，人還應該有被子蓋。

我家過去有五口人，父母哥嫂和我，我父親是個老實庄稼人，給人扛了大半輩子活。扛活的哪能養家。哥哥十多歲就到北京去學磨眼鏡的手藝。在敵偽時期，遇着日本人抓勞工，用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一去就是八九年。我媽想留住嫂孀，把討來的好一點的東西，都給了嫂孀和我，她自己總吃壞的。有時候我父親找不到扛活的主兒，日子就更難過了，後來嫂孀只好改嫁了。我五歲，就跟着母親到處要飯，整整過了十年討飯生活。

我十五歲那年，日子實在過不下去，父親這才托人說情把我送到地主康家當小半活。他自己由人介紹到八里外東壩鎮的一家客店去當雜役，打更、喂牲口什麼都得干，掙的錢還不夠他一個人糊口。離開家的那天，父親淚流滿面地對我母親說：“二騷子他媽！我對不起你們，我無能，養活不了你們，你算白跟我一場了。你跟着我命苦，只能討一輩子飯。咱們還是各人奔各人的路好了。”

我媽哭着對父親說：“二騷子他爸，你出門去，還是常家來吧！好歹這總是你的家啊！”

就这样，一家人被生活逼得东零西散。我媽指望着我在地主家要比討飯时好一些，誰知道，我自从走进了康家的門，就沒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活累就甭提了。到康家才两年的工夫我的腰就駝成了鑷刀背。我怕媽啾着难受，好久沒家去看她了。再說，三年总共才掙那么几斗棒子，拿回去給媽，心里实在窝囊。我不願空着手回家，看着媽受苦挨餓。地主家的規矩又多，扛活的不許随便回家，地主狗腿子一瞅見扛活的回家，不是說你窝工，就是說你偷了东西想往家拿。这样，我一橫心，三年就沒回过几次家。

我往家跑的时候，就像后头有人拿鞭子抽我一样，我真后悔，我該早回家的。

(三)

在离家半里路的小土坡上，我瞅見了我那苦命的媽，她头朝坡下，脚朝上，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我哪里认得出这是我的亲媽啊！她全身水肿，头肿得像斗那么大，手脚和臉都变了形，眼窝塌陷成两个黑洞，鼻子和两頰一般平，膿水从伤口流出来，蛆虫爬了一身……。

“媽！”我叫了一声，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自从我父亲和我离开家以后，她想我們想得天天哭，最后把眼都哭瞎了。有一回，她到康家去討飯，想看看我，可是，康家养了二十多条狗，咬得她膝盖鮮血直流；以后，她还天天在路上等着，盼望我赶着猪走过她的身边。有时候，孩子們淘气，把豆叶儿放在手窝里，拍打得啪啪地响，媽听見

还以为是我赶着猪过来了，她就使劲地喊：“二騷子！二騷子啊！”

可我又哪能听到她的喊声呢！

在康家，我天天到村东河沿去放猪，媽就住在村西。我家离康家才二里路，就像隔着一条无情的河，叫我們亲人不能相見！

我媽討了一輩子飯。她活了四十五岁，这是甚么样的四十五年啊！到临死的前两年，她完全不能走道了，就在地上爬，每天早上，从家里爬出去，晚上又爬回来。就这样爬呀，爬呀……今天，实在沒法爬回去了。后来我找堂哥用破門板把她抬回家来。

“三嫂子，你天天念着二騷子，二騷子回来了。”大嫂子說。

我媽嘴角动了动，沒有听出她說什么話。

“媽！我家来了。”我凑近她耳朵边說。

媽的手动了动，她像是要摸摸我。我連忙把臉靠在她的手上，我媽的手指在我臉上摸着。当时，我真怕我媽摸着我的罗鍋腰，引起她的伤心。

“媽！你想說什么啊？”



“杏……”媽用了很大的勁才說出這個字。

我連忙跑到街上小鋪里除了半斤杏子。那陣店主不相信咱一個扛半活的，這筆賬是記在大嬸名下的。除了杏子回來，媽像是緩過來了，她一口氣把杏子都吃了，有一半還是青的，她也吃了……。

媽沒死的時候，我總是盼着自己快點長大，多掙點錢養活她，哪曉得，我最後一次見她時，還是空着兩隻手。我這個做兒子的，給地主扛了幾年活，連她最後想吃一點杏子還是賒欠的！

媽聽說我是請假來家的，她怕地主要歇我的工，催着我趕快回康家。誰知這一走啊，我們母子倆就此生離死別了！

這天半夜三更，康家扛活的都起床了，我也起床了，正準備下地去拔麥子，大嬸又來叫我了。這回，我心里比什么都明白，又告了半天假，摸黑到東壩去告訴父親。父親當時正打更，沒人替，只得等到天明敲過五更才趕回來。

父親的同事，七拼八湊好容易才湊了點錢，買了幾塊五分厚的木板，做了一個匣子，我和堂哥挖了一個坑，把母親埋葬了。

這就是我母親的一生，這就是舊社會一個窮苦女人的一生。

至今想起來，我的心里還像腌着一把鹽那樣難受。俗話說，一個女人有夫有子就不算窮，可是，那年頭，我們一家子三個庄稼漢，竟連一個女人也養活不了。

解放了，我們一家子團圓了，六十多歲的父親告老還

乡，四方流浪的哥哥在外面当了解放军，也复员回来了。我们分了房分了地，哥哥结了婚。全家人都盖上了新棉被，穿上了新棉衣。当我们第一次围坐在炕桌边，一家子欢欢喜喜地吃团圆饭时，我又想起了我那可怜的母亲，她没有能活到今天。死的时候她只敢盼望吃半斤杏子，这就是她一生最后的要求，也是她最大的要求了。那年头，她还能盼什么，又敢盼什么呢？她又怎么敢想，咱们这一个穷家，还会有今天这样，全家团圆，过着不愁衣食的好生活？

（譚家昆 記）

受尽欺压的苦日子

——記貧农李清的回憶

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自打水缸那么高的个儿起，直到解放，就靠給地主家扛活过日子。穷哥們、老街坊都知道咱是个老实人。要現在說來，老实人誰不喜欢。可是解放以前，越老实就越受欺負，越遭殃。我在旧社会过了六十三年。唉！那六十三年呐，可真連一口粗气也沒敢喘啊。

就拿日本統治时期來說吧，沒有一天不提心吊胆的。我們家，有两口子死在日本鬼子和伪軍的手里。我的大儿子李万全，无端給鬼子使快枪打死了。他死的时候，媳妇才二十三岁，年紀輕輕的，就带着两个孩子守寡，那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可是到这个地步，鬼子和伪軍，还不让她过下去，沒多久，又把她的小儿子也折磨死了。

庄上的人都知道，一九四五年，庄上几百人被日本鬼子抓去过电的事情。一提这事儿，我儿媳妇陈淑琴就要掉泪。有一天大清早，她正在給小儿子喂奶的时候，猛地，保公所的狗腿子来叫她上庙里“开会”，咱穷人哪敢不去。我儿媳妇剛到庙門口，伪自卫队就端着枪，大声吆喝着，把她們押到

日本一四一八部队特务高桥那儿去。一到那儿，鬼子把她们圈在一个大屋子里，跪在洋灰地上，连声也不许吭。那高桥穿着皮靴，挎着长刀走出来，劈头就问：“你的，你们的庄上有八路来开会的没有？”没有人吭声。他再问，还是没人说话。他就大喊了一声，在一旁的鬼子就捉了一个老乡过去，耳朵上夹了两个夹子，夹子上两条电线联着一个匣子，嗡嗡一摇那匣子，只一眨眼工夫，那个乡亲就在地上乱滚，不一会儿，就昏死过去……接着又捉了好几个人去过电，万全媳妇吓得浑身瘫软，不吃，不睡，直折腾了两天才被放回来。

家里呐，自打她被抓走，撂下两个儿子整天哭，也是不吃不喝，闹腾了两天。那天听说要回来了，我老伴就抱着小的领着大的，上大桥头去接，盼了好半天，才看见儿媳妇擦着眼泪跑回来。那孩子三天没见娘，眼睛肿了，嗓子也哑了。这一回看见母亲，就要吃奶。她呐，死里逃生，好不容易又跟孩子重逢，就不顾奶馊，喂给儿子吃了。小儿子吃了馊奶就整天发烧，拉肚子。那阵咱穷人哪有药治，不过四五天，连哭带病就死去了。

鬼子在的那阵儿，日子可真像油锅里一样难熬，一年到头，就盼着早一天把鬼子打跑。只要过上太平日子，就是喝白开水也愿意啊！后来，听说鬼子投降，都高兴得了不得。谁知道，走了一只虎，又来了一只狼，国民党反动派也一样是害人精，由这往下，咱的苦一点也没少吃。

那阵，县衙门以下，有大乡、联保，什么保公所、乡公所、“自卫队”都在咱们庄的大庙里，那庙就像阎王殿一样，多少

穷人在那里头受尽折磨。庙门口，经常挎着枪进进出出的是“小白秃”馮連貴、杜潤和“小黑駱”程德喜这些人。这些人，平时专干敲詐勒索的勾当，天天使鉄壶打酒，喝得醉熏熏的，又扛起枪，到处欺压人。穷人见到他們，連照面都不敢打，离老远就得躲开，要不就遭罪。有一次，不知道开个什么会，我站得歪了一丁点儿，就给程德喜打了几个耳光。像这样挨打受罵，那时是家常便飯，数也数不完。

一九四六年，大秋剛过，“小白秃”就要抓壮丁了，咱家三小子——李万增那陣整十九岁，“小黑駱”来傳我去給儿子抓鬮。在杜家地主門前有一座五圣庵，抓鬮就在那个地方。我到的时候，早有許多穷哥們站上队了。在大伙面前，摆着一張高桌，上边擱一只大碗，里头装着紙捻儿。旁边坐着“小白秃”和“小黑駱”，挎着枪，臉上的酒气好像还没消。“小白秃”恶狠狠地点着名，挨个上去抓。不一会儿就点到我的名字，我伸过手去那陣，心里直打鼓：千万别抓上啊！要不，亲骨肉就断送在这紙鬮儿上头了。嘿，真巧，我抓了一个白鬮儿，直打心眼里往外乐。哪知道，这一乐就惹来“小黑駱”一頓怒，他瞪着血絲眼，一拍桌子說：“不算！你得重抓！”誰願意拿自己的亲骨肉送死？我当然不抓，他就打过来几拳头，接着又一脚把我踢倒。我还没爬起来，又听得“小白秃”喊了一声，一下上来好多自卫队，一陣枪托，打得我渾身上下就像刀割一样，到处都疼。……也不知过了多大时候，我才被人搀着，慢慢走出那座“閻王殿”。嘴里覺得咸膩膩的，往外一吐，吐出了一口鮮血。渾身的骨头就像給拆散

了一样。这时候，还模模糊糊听得“小黑驹”说：“李清，你不抓，不抓也得交人出来！”

第三天大清早，我还躺在炕上养伤，猛听见“咣当”一声门响，紧跟着又听见“小黑驹”的声音：“叫你们快交兵！”万增他妈

向他央求说：“万增还没有吃饭，求您行行好，让他吃过饭再走。”那“小黑驹”连理也不理。我一骨碌爬起身来，看见三小子正被逼着一步一步往外走，他那正在坐月的媳妇，冲出门来，“哇”地一声就哭开了。紧跟着，全家人也都哭了。可是，那“小黑驹”还在大声地吆喝着：“走！走！走！”……

打那一走，开始还收到过他求人写来的信，到后来，就连音讯也没有了。全家人年年盼，月月望，至今生死下落不明。他的媳妇在家天天难受，没过多长时间，她的小儿子也死了，她也就离开了咱家。

家里还没有安定几天，又来了一桩更气人的事。一九四七年春天，一个大清早，咱家正愁没有米下锅，冷不丁闖进一个大个儿，一脸横肉，挎着盒子炮，这人就是“自卫队”长



杜潤，庄上的人沒一个不怕他的。他这一来，准要遭殃，我心里直哆嗦。他瞪着我，扯开嗓門就嚷着說：“出人命案了，你們家得交五斗粮！”

“人命案”和“五斗粮”，两个事儿哪儿挨得上边儿？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头一天，他們“自卫队”去撵一匹騾子，那騾子是他們拉別人的，給大乡长家使着。那一天，騾子“噌”地一下跑了，杜潤带着“自卫队”一帮人去追，一边追一边打枪。他們的枪沒打着騾子，却打死了一个在地里干活的庄稼人。打死了人以后，他們又有了向各戶敲詐的借口，他用大車拉着死尸，向各戶要粮。說实在的，咱那陣儿压根儿也沒粮食，就頂了他一句：“我沒有！”这下，那“自卫队”长冒火了，大牛眼狠狠地瞪了我一下，罵罵咧咧地說：“好，你不交——不交这人命案就交給你。”我一想，这更无端了，就說：“人命案跟我有什麼相干？”他解下身上的盒子炮，“啪！”地往炕上一撂，說：“这就把死尸抬进你們家来！”說完，一甩手噔噔噔走了。

全家人看着炕上的盒子枪，說不出一句話来，真不知道咋办，我老伴連吓带急，脑子嗡地一下就暈倒了！儿媳妇也吓得什麼似的。

您說，咱一个穷扛活的老实巴交，哪儿敢跟他斗！沒法，后来只得向人借了五斗粮食，連枪一块送了去，才算完事。

这真是天大的冤情，可是那年头，有冤也沒处伸哪！这口气，憋了好几年也沒敢透。解放了，啥事有毛主席、共产

党給撑腰,才敢吐这口气。如今,啥事都讲个民主,論个真理的,这真叫揚眉吐气啊!这陣儿人也特別和气,无論啥干部到庄上来,見着咱就“老大爷,老大爷”叫开了,那口儿甜得就像一家人。我這大半輩子,虽說沒出过門,可眼見耳听的事儿也不少,从来也沒見過有这么好的世道哇!

(莫文珍 記)

破庙一家人

——記貧农王秀荣的回忆

楼梓庄公社黎各庄大队部西边有一座大土坡，咱們第三小队的場院、飼养房、队部都在那儿。您看現在又是牛又是馬，又是騾子又是車。每年大麦、二秋，社員在那儿欢天喜地分粮食、分菜；一到晚半晌，队部电灯一亮，社員、干部还在那儿开会，白天夜晚总是那么热热闹闹的。可是在解放前，这样的日子做梦也想不到哇！那时候，这儿是座破庙，名叫真武庙，因为多年失修，里面破破烂烂的。冬天北風刮，寒氣逼人，夏天又髒又潮，蚊蝇成群，庄上小輩儿的人不要說見過，恐怕很少听說过它。可我这六十岁的老太婆在那儿住了整整三十一年，那儿的一块磚，一片瓦，甚至一条破門檻我都記得一清二楚。

我在五六岁能記事的时候，听我母亲說过，我是在庙里生下来的。那时候，我們一家四口人——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父亲为人老誠，身子骨也壯实，地里的活、場上的活，样样提得起来，可真是有个能耐的庄稼人。可那年头，多有能耐的穷人也得受地主的气。父亲从小就在地主西孙家干

活。从小半活到长工，劳碌奔波了半辈子，連間土房都沒有掙上。一家四口挤在那座破庙的东厢耳房里，长年累月地挨餓受冻。

我們这里十年九涝。遇到涝年头，穷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有一年是个涝年头，一家人好几天揭不开鍋盖。父亲終日在外边奔跑，可一点粮食也借不来。那时我剛剛六岁，什么都不懂，只知道餓了哭，累了睡。姐姐十三岁了，因为母亲双目失明，家务事全仗她一个人操持着。整天的劳累，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那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总是充滿了愁苦和沉悶。父亲經常叹气說：“大了头命苦啊！不如送給人家当童养媳，遇上个好公婆，或許还能轉轉运。”我不懂得什么叫童养媳，只知道，姐姐是个好姐姐，我舍不得离开她。但这怎么出得了我呢！

記得有一天傍晚，我和母亲縮在一堆烂草上，身上披着一片破麻布，姐姐坐在破灶边，眼睛发呆地望着鍋底，等着父亲借点吃的回来。那时候，我已經哭了整整的一天，眼泪流尽了，嗓子也喊干了，两片小嘴唇只是有气无力地張合着，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字：“餓！”

媽媽大概是习惯了我的哭喊，她不打我，也不罵我，反而紧紧地摟着我；我想掙脫她，可一点力气也沒有，只好懶洋洋地偎在她的身上，餓一陣，哭一陣，睡一陣……。迷迷糊糊地听见媽媽在細声地讲话，仿佛是在讲故事。我眯着眼睛……忽然，看見破門檻外跨进来一只沾滿泥巴的大脚。父亲回来了！

父亲的脸上挂着一丝苦笑，手里提着半袋玉米面。我和姐姐惊愣得发呆，哪儿来的这么多粮食啊！爸爸把玉米面放在墙犄角，走到母亲的身旁，在她耳边叽咕了一阵。母亲的两只眼直愣愣地流着泪，哆嗦着双手向前伸着，叫着姐姐的小名：“大妞儿！大妞儿！”姐姐扑在母亲的怀里。我知道，一件不平常的事情要发生了，我忘记了饿，大声地哭了起来。



第二天，姐姐就让尹各庄有钱的人领走了，半袋玉米面换去了一个亲姐姐。这是什么世道？打那以后，我再也没看到我的姐姐，听人说她在那家受气不过，跑了。跑到哪儿去了？问谁谁也不知道。

这就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其它的事我记不大清，但我记得一个字，那就是“苦”！

十二三岁我就能干很多的活了。父亲还在西孙家扛活，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大子儿。有时，他还要砍些柴担到通县城里去卖。每到大麦、二秋，我还要到地里去捡点庄稼。一家人饱一顿，饥一顿，勉强地过日子。但这样饥寒劳碌的日子也过不长，在那年的秋天，一件不幸的事又发生了。

那时候，庄稼都收了，场也打了，西孙家在大片土地上刮来的粮食入库的入库，运走的运走。温榆河上拉船下水，装粮起运，整天价忙个不休。船上运走的是大米白面，运回的是綾罗綢緞。粮食、貨物把船都快压沉了，可这些全是西孙家的。

有一天，爸爸给西孙家拉船。这个活白卖力气还不算，有时不小心船会拉翻，死不了也要落个残疾，谁还愿卖这个命！

那天下着毛毛雨，将近傍晚，我从地里捡了半篮子白薯，便急着往家跑。路过温榆河的时候，我还在河岸上望了望，河上起风了，河水黑沉沉地，运货的船连影子也瞧不见。我想妈妈大概已经饿了，我得赶紧回去做饭，要是父亲晚上回来，还能赶上喝一碗热呼呼的白薯粥。

妈妈的耳朵可真灵，没等我进门，她就叫着我的小名：“荣子，回来了！”我提着那篮白薯，送到了她面前，也忘记她失明了，叫着：“看——白薯！”母亲两只枯瘦的手在篮子里摸了摸，一面摸，一面高兴地说：“好孩子，好孩子……”

白薯熟了，热气腾腾地。我刚要往外捡，猛听见外面有沉重、杂乱的脚步声渐渐逼近。回头一看，父亲仰面朝天地被人们抬了进来。脸色煞白煞白，腰上一滩血，滴滴嗒嗒地往下淌。我吓得直哆嗦。

那年头，富人有病套车进城上医院，穷人有病只好躺在炕上活受罪。父亲在炕上躺了好几天，整天不住地呻吟；妈妈守在身边，眼睛哭出了血，就是没有辙。庄上的穷哥们常常来看父亲，他们说，船是孙家的，给他家干活，伤了人，他家总不能不管吧！一天，周大伯带着我去到西孙家，想求求财主请个先生瞧瞧。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孙家财主刚刚睡完午觉，他嘴里叼了个旱烟袋，闭着一只眼，斜着一只眼，走了出来。见了我使用旱烟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爹怎么还不上工啊？受点伤歇了这么多天，都像他这个样子，我西孙家全让你们给吃光了！”我吓得不知怎么回答。大伯对他说：“老王头实在疼得起不了炕，想求求您请个先生，瞧好了病好替您干活……。”没等大伯说完，财主的眼睛瞪得鸡蛋那么大，一声喝住，说：“放屁！孙家又不是医院，你求的什么医？那个老梆子干活就知道偷懒，谁偷懒船就砸谁，活该！”一甩袖子，扭头走了。

天下穷人是一家，庄上的穷哥们不忍心见我父亲痛苦地死去，凑了点钱求来了一位瞧病的先生。先生草率地看了一遍说，腰骨让船给砸断了，怕很难治好，抹上了点药膏，以后便再也没有来。爸爸躺了好几个月，命保住了，可痛苦把

他折磨得干黃精瘦，他的腰至死也沒有直起來，成了個羅鍋子。孫家怎麼能要羅鍋子扛長活呢？父親白干了一年活，工錢沒給不算，還落了個殘廢，便被西孫家趕出了大門。從此以後，父親只好撐着一根棗木棍，出去討飯度日。

那個時候要飯可真苦。莊上的窮哥們時常周濟點吃的給我們，可他們自己還揭不開鍋蓋，父親怎麼好意思老打攪他們呢？每天，他起早貪黑不是到皮村，就是到沙窩，從不在本莊露面。他老人家討來的飯不夠一家人吃的。媽媽自打父親讓船砸傷以後，日夜操勞受累，心裡着急，身子更是一天不如一天。我只好提着破籃子出去要飯。每天我很早就起來，要了一天的飯，剩點稠一些、新鮮一點的飯帶回家去，喂她老人家。這座破廟一年破似一年，母親整天躺在東廂廟房的爛草窩里。我很害怕，怕她突然死去。傍晚回來，我總要先在門口叫她一聲，等裡面有了動靜，我才敢進去。

到我十七歲那年，我可怜的媽媽沒留下一句話就死了。家裡窮得連口破木棺材都買不起，只好用領破席包好埋了。父親年老多病，每天要飯回到家裡不是想姐姐，就是想媽媽。看我年歲不小了，也該出嫁了，可又舍不得我，更怕我遭到與姐姐同樣的命運，便給我招了個女婿。

我那口子可是個能干的莊稼漢，寬肩膀，中溜個兒，黑呼呼的臉龐上有一對明亮有神的大眼睛，老實憨厚，見了我只會咧着大嘴笑。結婚那天，父親和東莊的窮哥們不願草草了事，雇了乘破轎子，吹吹打打地把我從真武廟的東

厢房抬了出来，繞着大街走了一圈，便又抬回真武庙的西厢房。后来有人說我是“真武庙生，真武庙聘，真武庙娶，东屋上轿子，西房下轿子。”这句话至今儿我还記得。想起这句话可真让人心酸哪！那时候的日子可太难了。您想，我父亲住破庙，扛长活；生下了我还住破庙，我那口子还是扛长活；我生下孩子仍然是住破庙扛长活。有个看庙的老和尚說：“住破庙、扛长活，你們家的人命中注定了。”

現今，破庙早塌了，庙地盖上了三队的新队部。每天上工下工的时候，我常常对年青人提那座破庙，也許有人嫌我絮叨，可您知道，过去的苦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如今，住过庙的人还在，那个大土坡还在，破庙却沒了，誰也不扛长活了，生活完全变了样。說什么“住破庙、扛长活，命中注定”，那全是鬼話。依我說，現在人民公社是我們穷人的家，共产党、毛主席是穷人的救命恩人。那些地主老財、国民党反动派千秋万世也别再想搬倒咱們了！

（安志强 記）

苦難的童年

——貧農郭瑞、何淑英的家史

樓梓庄，這五百多戶人家的村子，在河北大平原內，遠遠望去，一片綠色的樹木，遮掩着東一座西一座的房屋。有的屋頂上晒着金黃的棒子，有的屋頂上晾着雪白的白薯干。風撲面吹來，你簡直可以聞着糧食的香味。

每戶人家都有三間或五間一排的房屋，前後左右，用土牆或者籬笆，圍出空地，種着蔬菜和煙草。籬邊牆邊，還長着果木樹。棗子低垂下來，伸手可摘。向日葵高抬起頭，陽光照着，喜笑顏開。

一個年輕的婦女，身穿花布衣服，昂着頭，剪短的发上，包着花頭巾，匆匆走進一家院子。葡萄架下一群雞，驚動一下，但看見是它們的主人，也就安靜下來。菜地邊上小土屋里的豬，以為有人來喂它了，哼哼地叫了起來。一排三間紅磚砌的新房子，當中一扇嵌有玻璃的木門，立在她的面前。她來不及推門進去，兩個一大一小的胖男孩，就跑出來迎接。她是趁社員們休息的時候，從地里趕回來，奶她的嬰孩的。她那紫黑的臉上，有兩處挺打眼的紅色，這是陽光和勞

动给她打上的标记,美丽和健康。

新铺的炕席上,盘足坐着六十多岁的母亲,把脸红红的婴孩,抱给女儿喂奶,一面又抽动针线,缝小孩的衣服。六岁大的孩子,顽皮得很,高兴妈妈回来了,一下开了电灯,一下又开了收音机,使得这间糊有花纸顶篷的屋子,充满了音乐和亮光。屋里三个孩子,也算够热闹的了,但粉白的壁上,还贴有五彩的画像,一群胖孩子,正搬运着一个挺大的桃子,让毛主席愉快地站在旁边看。靠壁一张黑漆的条案上,摆着磁瓶、热水瓶和钟。这时钟指出的时间,正是上午十一点。

到了十二点多钟,又有一个青年男子,身穿浅蓝色干部衣服和黄色的军人裤子,骑着脚踏车,飞也似地跑了回来。他那脸子,稍微有点紫黑,显得朴实而又严肃,老是有事在身似的。这样一来,你就看见这个家庭所有的成员了。他叫郭瑞,楼梓庄公社的副主任,专管全社的水利工作。他的爱人何淑英,是楼梓庄大队园田北队的社员。他们的生活过得挺幸福。何淑英一九六二年挣三千七百多工分,分了一千五百斤粮食,足够一家人吃一年多,郭瑞一月三十三元的工资,那就花不完了。

但你如果听见这对年轻夫妇的出身和经历,你会大吃一惊,怎么他们解放前受过那么多的苦难?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楼梓庄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贫下中农社员个个诉苦,讲他们解放前的悲惨生活。郭瑞在诉苦大会上,讲他解放前的痛苦,泣不成声。何淑英说她童年的苦日子,

听的人伤心落泪。

郭瑞他家也有四亩地，但这是祖宗留下来葬坟用的，已经埋有二三十座坟，剩下的只有三亩多点。地势高，什么也不能种。勉强种点白薯，收来卖了，还不够缴各样的苛捐杂税。郭瑞的祖父郭顺在的时候，就靠扛长活、赶驷车过日子。父亲郭庆隆学做点心手艺，但也常常失业，在北京街上拉洋车，这是难于养家的。住在楼梓庄的母亲郭胖氏，就把大女儿早早嫁了，又把大儿子交给人家去放猪，留下郭瑞和他的弟弟妹妹，还是养活不了，自己就到地主富农那里去打短，做零活。郭瑞自从记事起，就看见母亲一早起来，把地里扯来的野菜剁碎放在锅里用水煮，再放上一小碗棒子面，熬成稀粥。没有野菜的时候，就放上榆树叶子。这都很难吃，又苦又涩。弟弟妹妹，看着就哭，端着碗喝不下。母亲哄着说：“晚上给你们带好吃的回来。”就跟人家到地里刨苗去了。母亲在人家那里，总是饿着肚子不吃晚饭，就把自己该吃的那一份，带回家来，让孩子们吃。可是哪里够三个孩子吃呢？母亲总是安慰孩子们说：“不要哭，爸爸带钱回来，你们就可以饱吃一顿。”孩子们就把希望放在爸爸身上，天天都在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有时候，弟弟妹妹饿得直哭，郭瑞便带他们走出村子，向西面的天边，望了又望，因为爸爸总是从西面回来的。看见绿荫荫的包谷地边，有个人影子，以为是爸爸，便欢喜地叫起来。等到走近了，才看出不是，就又难过起来。好容易盼了两个月，把爸爸盼回来了，全家正在喜欢的时候，妈妈又同爸爸吵架了，妈妈埋怨

他錢帶回來少了。爸爸悲痛地說：“有什麼法子呢？我就差一點沒把脖子掙斷哪。”有一次，爸爸急得沒有法子，當天晚上就要離家出走，還嚷起來：“我後腦勺一朝東，你就給我燒紙吧！”媽媽死拉着爸爸不放手，一面哭着說：“你死，我也死去！”吓得孩子們都哭了起來。

有一個很短的時期，爸爸找到職業，可以做點心手藝了，工錢帶回家來，也就多點。爸爸媽媽就起了雄心壯志，要送郭瑞進小學念書，希望這個兒子有個好的前程。因為大兒子有點傻，小兒子又小，只有郭瑞聰明，老實，又聽話，全把希望放在郭瑞身上。郭瑞一進村中的小學校，完全處在一個新的天地裏面，喜歡得了不得，他非常用功，功課樣樣學得好。可是，真是俗話說的，好景不常，爸爸不久又失業了，重新過拉洋車的生活。郭瑞常常餓着肚子去上課，有時餓得頭髮昏，眼發花，看着書上的字一個個都在跳。念到第二學期，就交不起學費了。媽媽看見郭瑞瘦得可憐，怕他生病，不讓他再讀下去。同時家里沒柴禾燒，要人去撿柴禾，又需要有人去刨野菜，摘榆樹葉子。郭瑞只好放下書本。郭瑞要是沒有進過學校，沒有引起讀書的欲望，也就勉強過下去；不幸進了學校，非常愛念書，一下子不能去學校了，這就很痛苦。早上起來，站在門口，看見同學一個個高高兴兴，朝學校走去，簡直忍不住流下了眼淚。這是他想起童年的時代，算是一件最傷心的事情。

郭瑞讀不成書，就背着柳條筐子，到地里去找可吃的野菜野草，去摘榆樹葉子，又到處去撿柴草，好拿回家來，給

媽媽煮早上吃的那頓稀粥。一般給地主富农扛长活和打零工的，早午飯都是送到地里吃。郭瑞便跟一些穷人和穷孩子，等在地里，让人家吃了，討点剩下的来吃。常常是在这家地里要一点，又赶到那家地里去討一点。这叫做赶飯。好多北方的穷人，都赶过飯的。赶飯的时候，遇着地里全是扛长活和打零工的，他們就能让你吃点剩的。有时他們还会看着郭瑞說：“这孩子瘦得可怜，我們少吃一口，剩点給他吃吧。”要是碰見主人也在地里，即使还有剩的，不但不給你吃，还会罵你：“滾开，你們这些穷餓不死的，我家猪还没吃的呢！”

郭瑞的媽給人做零活，常常不吃晚飯，帶回来給孩子們吃，自己餓得面黃肌瘦，肚子肿了，腿也肿了，走不动路。



病在家里，不能出去干活，又沒吃的。她看見孩子餓得哭，自己也餓得心里发慌，就叫郭瑞到她娘家去借两碗棒子面。娘家姓胖，只有一个哥哥，住里馬各庄，离楼梓庄有四里地。他家种地，生活过得不坏。郭瑞提个口袋去，一进舅舅家門，就哀求着說：“舅舅，舅母，我媽病了，沒吃的，要借点棒子。”舅父、舅母都黑起臉，沒有理睬，也不問他媽害了什么病。郭瑞几乎要哭起来。舅母才說：“我們也沒吃的。你来了，不让你空手回去。”她就給郭瑞两个棒子面做的小餅子。这够誰吃呢？郭瑞回到家里，一句話也不說，就哭了起来。媽媽看見口袋空空的，就忍着眼泪說：“人穷了，就不认你什么亲戚，見死也不救……穷人不登富人門。以后甭找他們。”从此，他們就跟舅舅家断了亲戚关系。

母亲的病，越来越重。有一天早上，天已大亮，郭瑞自己醒来，有点詫异，因为往年都是媽媽叫醒他的。他披起破烂的衣服，就叫媽媽，沒有答应。伸手去掀，又掀不动，拉媽媽的手，又摸媽媽的臉，都是冰冷的，他又惊又怕，赶紧去找隔壁邻居。有个大娘跑来看，吓得叫起来，惊慌地告訴郭瑞：“可怜的，你媽媽都断气了。”他跟弟弟妹妹，扑在媽媽尸体上，大哭起来。媽媽就是又病又餓死了的，再也活不过来了。

托人找父亲回来，东借西討，才买到一副狗碰头的棺材。所謂狗碰头的棺材，就是棺材板薄得很，又做得坏，只消狗去一碰，就会散了的。埋的那一天，沒有白布戴孝，只有跟人家借点白帶子，挽在孩子的袖子上，表示一点心意，

就这样馬馬虎虎把媽送到坟地上。不管怎样，媽媽总算有个安頓地方，不再受苦了。孩子們怎么办呢？郭瑞才十岁，妹妹九岁，弟弟六岁。爸爸就把妹妹送到姑母那里做童养媳，把郭瑞送到北京城内做学徒，他自己带着最小的儿子去拉洋車。一家人就这样散了，各奔前程。郭瑞在西四牌楼一家窝窝头店內做学徒，实际没有什么学的，只是洗碗、掏炉灰、倒泔水，混混飯吃，一个工錢也沒有。晚上沒有地方睡，就躺在一条板凳上头，常常一翻身就跌在地上，有时跌醒，有时跌下去，困得就一直在地上睡着了。窝窝头从沒吃过新鮮的，总是吃头天卖剩下的，又餓又硬。三个学徒都吃不下，偷一个新鮮的窝窝头来分，搭着餓的吃，好容易吞下，老板看見了，就得挨一頓耳光。四个年头就是这样过去的，郭瑞从沒有到过什么地方，北海公园那么近，西郊动物园那么使孩子感到兴趣，他都沒有去过。他只在老板严厉的臉色和无情的拳头下面，打发了他童年的岁月。这是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領北京的时候，他在店門口，看見过日本兵坐洋車不給錢，白拿小販挑的魚和小菜。接着国民党中央軍又来了，并不比日本兵好一点。有一次，駐在府右街的中央軍，向鋪子定了几十斤大餅和窝窝头，老板叫郭瑞送去，一个錢也不給。郭瑞怕回去挨打，就不肯走。中央軍的軍官就把他打了出来。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給他留下了多么痛苦的痕迹！每回爸爸来看他，他都哭着要回家去。这次要求更加坚决了，他流着眼泪向爸爸說：“就是回到乡下去討飯，也比城里活受罪好。”爸爸拉洋車，挨过日本兵的打，气

是受够了的。现在又受中央军的气，他们白坐车，不给钱，让咱穷人吃什么呢？他又听说做童养媳的女儿，在姑母家里也活不下去了，就只好把儿子女儿带回楼梓庄。

这时郭瑞十四岁，妹妹十三岁，可以干活了，爸爸就买点绿豆，推成豆浆，熬熟后做成嘎渣，叫郭瑞和妹妹挑到东壩街上去卖。另外也叫郭瑞在楼梓庄和附近的庄上卖。有一次，郭瑞经过恶霸地主王殿臣的门前，王殿臣一下就拿了五个嘎渣，一个钱也不给。只是说：“你先回去，叫你爸爸记上账，以后有钱，再给你。”郭瑞晓得他一向是白吃不给钱的，就哀求他：“我们还要上东壩街买豆子。没有现钱，就买不起。你手里有钱，给我算了。”王殿臣理也不理，回头就进去了。郭瑞哭了回来，告诉爸爸。爸爸说：“惹不起他，算了吧。以后别走他门口过。”王殿臣原来是楼梓庄火乡的乡长，手下有几十个武装，势力挺大，谁也不敢惹他。他手下的一个保长，叫冯连贵，经常带起枪，横行乡里；郭瑞见了，他，赶快躲开，知道他也跟王殿臣一样，白吃不给钱。但冯连贵更加可恶，常常跑到郭瑞家来拿嘎渣。爸爸气得没有办法，只有捶打自己的胸口。本钱一天一天地短少，怎么买豆子做生意呢？城里叫人活不下，乡里也叫人活不下，穷人真是没有路了。看见儿女们饿得直哭，父亲真是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晚上到大地主杜文华的地里去掰棒子，结果被地主狗腿子抓到楼梓庄庙里去毒打了一顿，还叫父亲叩头，才放回来。穷人自己做点小生意，东西随便给地主和狗腿子拿走，不敢说一言半语，自己去拿地主一点东西，就打的要

死,这是什么鬼世界啊,这样的不公平!

爸爸只好叫郭瑞到楼梓庄何家去放羊。四十八头羊,外加两头猪,都归郭瑞一个人放。他就整天穿一条短裤,披一条洋面口袋,拿着鞭子,跟在羊群后面,沿着小壩河走。羊多了,又加两头猪,很不好管,一不小心,就吃了人家的庄稼。人家跑来就是几记耳光。最气人的是有一次河边地里的庄稼,给别人放的羊吃了,人家红不说白不说,也来给他一顿打。他深深感到,有田有地的人,是这样横蛮、不讲道理。郭瑞回去又告诉姓何的主人。主人家不但不同情,反而嘲笑地说:“你们这批放羊的,就是不小心,都该挨打。”因为姓何的主人庄稼也让别人的羊吃过。

冬天,这家姓何的主人,就叫他的儿子带着郭瑞在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把羊轰到别人的田里去吃麦苗。秋分种的麦子,到了冬天,麦苗冻了,羊吃了,还可以长出来,但却受很大的影响,明年春天一定发不好,所以谁家的麦苗,也不肯让羊去吃。姓何的主人就想出晚上偷着放羊的妙计,白天看好人家的麦地,晚上放羊去吃。而且总选在天冷风大的晚上,免得被人发觉。他们全不管放羊吃别人的庄稼是不应该做的事了。郭瑞披件破棉袄,挡不住冷风,脚又冻得开裂,晚上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挺困难;但吃人家的饭,得听人家使唤,不能不去。有一次,半夜后,放羊回家一数,糟糕,少了一只,若不是有何家的儿子在一道,准定要挨打的。只是挨了一顿骂,但挨完骂,还是要冒着风寒,出去寻找。这就更加冷了,天又黑,多么不容易找啊!羊有个习惯,总是边

吃边頂風走的。郭瑞懂得这一点，就迎头吹着風趕去，風像刀一样刮臉，耳朵疼得要命，眼泪鼻涕都吹出来了。同时心里又急又害怕，万一羊找不着了，自己怎么办呢？挨頓打不說，以后人家还要你放羊嗎？回到家里又怎么活呢？好不容易找了半夜找到了羊，算是躲过了苦难的一关，但人却从此病了好几天。

何家种七十亩地、十亩菜园（一亩菜园相当十亩地的工作），平时雇三个扛长活的，一个扛半活的，加上放羊的郭瑞，一共五个人。这何家待人挺刻薄，平时吃的很坏，只有中秋和端午吃的好一点。郭瑞記得过中秋那一天，吃过一回肉，但全是肥的，嚼在嘴里咯噔咯噔响，嚼不烂，又不好吃，勉强吞了两三块，就把人腻住了。后来，才知道何家有一套煮肉的办法，把肥肉煮得半生不熟的时候，一下子放到凉水里去浸着，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端出来吃。使你做工的，不能多吃。这样一来，他是照老規矩办事，过节招待了长工，而又花钱不多。这样，干活的不但过节沒有吃好，还要受罪，拉几天肚子。

有一天，晚飯后，郭瑞同一个扛半活的張永海，走到何家大門，要到干活住的場屋去睡覺，忽然看見两个黑影站在門边上。他們問郭瑞他們干嗎去。郭瑞回答：“到場屋睡覺。”郭瑞他們听出这問話的声音是馮連貴和程德喜，他們是恶霸地主王殿臣底下的武装狗腿子，常常在村里行凶作恶。他們說：“你們两个跟我們走。”郭瑞和張永海知道事情不好，大着胆子問：“去干什么？”他們粗声粗气地說：“你們

甯問，到那里就知道。”兩人請求他們說：“跟何家說一說，行不行？”他們說：“不行，跟我們走。”還拔出盒子槍威吓他們，把他們押到鄉公所內。王殿臣和“自衛隊”長杜潤已坐在那里。王殿臣說：“有錢出錢，沒錢出人，你們兩家樂于出錢，還是樂于當兵？”這下子，郭瑞他們才明白了，這些人是給國民黨拉兵的。兩個年青人都一下吓呆了，說不出話來。程德喜瞪起眼睛罵他們：“現在你們兩人，有錢也不行，你們哥三個，去兩個，哥兩個，去一個。你們現在先去一個。”馮連貴又哄他們：“你們去當兵吧，一個人給二十石棒子。待不多久，就能回來。”郭瑞那時才十六歲，怯生生地說：“我才十六歲，人家要嗎？”馮連貴說：“你去頂個名，不要，你就回來。”張永海比郭瑞大兩三歲，結里結巴地說：“讓我……回去……跟家里……說一說。”杜潤厲聲地說：“來到這里了，就甯想回去。”就在鄉公所里，關了一夜，第二天吃了午飯，王殿臣帶着杜潤、程德喜、馮連貴他們二十多個武裝，把郭瑞、張永海連同其他拉來的壯丁，用一條長繩子，拴成一長串，押到通縣去。一離村子不遠，壯丁的家屬都知道了，趕着去求情。哭的哭，嚷的嚷，鬧成一片。郭瑞的爸爸郭順也來了，他向王殿臣哀求：“孩子小，還不夠當兵的年齡，放了吧。”王殿臣說：“要放，就得出十石棒子。”郭順難過地說：“我自己一家人都沒吃的，今天還餓着肚子，哪里去找十石棒子。”爸爸說着說着就哭了起來。郭瑞也忍不住哭了。有什麼法子呢？交不出糧食，只好給他們押走。郭順一直把希望放在郭瑞身上，這下子抓去當兵，真是禍从天降，他一路

哭了回去，气得两个眼睛都瞎了，后来才医好一只。郭瑞押在路上，看见有人出了钱，就在路上放走了。到了通县检查站，楼梓庄的壮丁就剩下郭瑞、张永海这两个出不起钱的穷人。郭瑞一路上还想，他只有十六岁，不会检查上的，结果，不是那么一回事，他跟新兵一道关起，不准随便走动，从此，就再不能回家了。

在通县编成队伍，坐火车到徐水，然后步行到保定去。郭瑞多么想逃走啊，但是看见一个通县人，跳进一个长着葦子的水塘，给乱枪打死，水都染红了，就只好忍着。后来，从保定开到南口，又有两个北京人跳火车逃走，抓回来时，班长、排长都拿棍子打他，登时被打死，抛到野外。又看见一个四川籍的老兵，开小差抓回来，反起手，吊了一夜，第二天放了下来，两只手腕都变成紫黑的了，动弹不得。弟兄们看见他可怜，买酒精给他揉，都希望他好起来。不料大家没防备的时候，他用手榴弹把自己炸死了。郭瑞看见逃走只有死路一条，但不逃，又没法活下去。每天早晚吃稀饭，中午虽是干的，但也不给吃饱。盖的被子很薄，冬天冻得没法睡得着觉。晚上怕你逃走，衣裤都得脱光，由班长、排长全部收去，第二天早上才发下来。开始下操，手脚很笨，常常弄不清左右，一个向左转，就跟人家面对面，鼻子碰鼻子。还没来得及改正，拳头就打到胸口上来了。等到发餉的时候，郭瑞想寄点钱给父亲，但那些排长、班长和一些老兵，又要逼你要钱、推牌九，不赌不行，把你输的精光，才让你脱身。郭瑞感到很痛苦，觉得当兵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

幸好，不久北京解放了，郭瑞所在的交警十三纵队，改編为解放軍，从此，吃得飽，也吃得好了。新来的連、排、班长，以及指导員，又都完全是另一套作風，首先待人和气，沒有打罵。跟着，他們在部队里訪貧問苦，使有苦的士兵，說出多年的苦來。郭瑞訴了苦，又經指导員的分析指引，这下子才認識清了，自己家里几代苦得沒法生活，都是由于地主階級占了广大的土地，对劳动人民进行殘酷剝削的結果。同时还进一步明白了，这种不合理制度得以存在，不只因为有王殿臣、杜潤、馮連貴他們用武装来保护地主階級，而是因为还有蔣介石匪帮在維護着地主階級的利益。只有打倒了蔣介石那一群匪帮，貧苦的农民才能翻身起来，分到田地，可以好好地劳动过日子。原来連指导員看見郭瑞年紀小，劝他退伍，回到家乡去；土改分到田后，可以跟父亲一道过日子。但郭瑞一明白了真正的仇人是地主階級，是地主階級的保护者蔣介石匪帮那一群人，就再也不願放下枪了。他和那些在苦难中生活过来的兵士，一道发誓，决心要为自己，也为全中国貧苦的劳动人民报仇。郭瑞向連指导員发誓說，解放軍走到哪里，他就要跟到哪里。指导員沒有办法，只好留下郭瑞，叫郭瑞做他的通訊員。

郭瑞所在的部队，編进第四野战軍，追击蔣介石匪帮，打过黄河和长江，又长驅南下，直到广西和广东。郭瑞因为作战努力，工作又做得好，一九五〇年在广西八步县入团，一九五四年又在广东入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員。不久領導上調他到河南步兵学校学习，一直学了四年，成为一个

有文化有軍事科学的战斗員。由于他的哥哥参加中国人民志願軍，受了重伤，成为殘廢軍人，不能回家；父亲生病去世，家里一个弟弟，又因生病疯了，无人照顾，一九五八年領導上便要他复員回家。他在楼梓庄公社从事农业生产。以后，因为工作好，升为公社副主任，一直到今天，还是勤勤懇懇地担任这个职务。

郭瑞因为在解放軍受过階級教育，处事待人都有强烈的階級观点。因此，对于他的婚姻，也不例外，別人跟他介紹过几个姑娘，他都嫌她們的家庭成分不好，只有何淑英，他挺喜欢，因为何淑英出身貧穷，又肯劳动，又能吃苦，他小时是亲眼看見过的。

何淑英小时的确是穷苦得很，她家也是楼梓庄人。祖上留下两亩地，比郭瑞家的地还少，不消說，更是沒法生活。父亲何俊从小就到北京城做学徒，在前門一家帽鋪內学做皮帽子。不幸何淑英才两岁的时候，父亲就生病害羊癩瘋死了，丢下一儿一女。媽媽何傅氏沒法子活下去，就把儿女托人带着，自己跑到北京城里做保姆。做了十五年，换了三十多戶人家。因此，何淑英的童年，一直寄人篱下，过着苦难的日子。两岁的时候，寄养在尹各庄姥姥家，那是媽媽的娘家，該会把外孙女待得好一点，可是那是旧社会，有錢人总是认錢不认亲人，何淑英成为她家的拖累，看着就討厭，有点不对，就要罵她打她，恨不得把她赶走。有一回，何淑英出了疹子后，又害了重病，不等她断气，就把她丢在院子外边，墙角底下，只垫了一点柴草，让她躺着。媽媽听見女儿

病重，快要死了，冒着雨，赶回来看。看见孩子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丢在外边柴草里，淋得湿湿的，没有人管，又气又心疼，赶紧抱在怀里，一句话不说，就放声痛哭起来。妈妈没有进姥姥家的门，当夜就抱着女儿回到楼梓庄了。

妈妈请人把女儿的病医好，可是没有吃的，娘儿俩还是没法长住在一起，妈妈只得忍痛，把女儿送给楼梓庄黄家做童养媳，不要一个钱，还把祖宗留下的两亩地，也交给黄家。黄家占了这个便宜，仍不满足，只觉得出身太穷，不配作他家的儿媳妇，勉强当成了头看待。人家吃了饺子馒头，何淑英却只能喝点菜和棒子面煮的粥。更可恨的是，黄家专买日本人兴的那种“共和面”，和着菜熬粥给何淑英吃，那是橡子面做的，苦涩难吃，何淑英一端起碗就哭了起来。他们就骂她：“你这死了头，不吃就饿死你！”何淑英就只有选粥里菜吃。过着饥饿的日子，弄得面黄肌瘦，肚腹脖子细。

黄家种地又种园子，地里的活，家里的活，都要她这个八九岁的孩子干，晚上又不许早睡，弄得白天也要打瞌睡。正午家里人都在吃饭，却常常叫何淑英到园子里去看鸡。有一次，一坐在园地边上，就疲倦得要命，一下子就头一点一点地睡着了。这一来，鸡就去啄了菜。黄家他们娘儿俩，就来打她，她一挨打，便躲着跑。他们就揪倒她，骑在她身上，脱下鞋子，一顿乱打，打得她登时昏死过去。他们点燃草纸，熏她的鼻子。熏活了，他们便又骂她：“臭婊子养的，你还装死哩！”接着又拿鞋底打她。

有一天晚上，黄家公母俩，跟他们的儿子，熬狗肉吃，要

何淑英到院子里那間儲藏屋內，揪几个大蒜。院子里黑，儲藏室更黑，她知道大蒜瓣子挂在壁上，却因人矮揪不着。何淑英就踏上一个东西，好让身子垫高一点；不幸一脚踏在平耙上面，那是一把有八个铁齿的钉耙，每个尖齿都四寸多长，一根尖齿踏进脚板心，疼得何淑英尖叫起来，同时又因黑，看不清楚，以为给什么东西咬着了，吓得要命，拼命跑出屋子。那把平耙是专锄菜园的，带有五尺多长的木把子，也给何淑英拖了出来。刚跑出屋子不远，就疼得倒在地上。黄家那女人反而怪她没有把蒜送去，气势汹汹跑了出来，看见她满脚是血也不管。朝她踢了一脚，还大骂道：“你这死不中用的，就知道吃。”她全不问她为什么疼的哭，只是跑进储藏室，揪了蒜，就回屋里去吃狗肉了。吃完了便倒在炕上睡大觉。何淑英哭了好一阵，才拉脱平耙，爬回自己的屋子睡下。她这只脚一直肿了一个多月。再加何淑英有癩，病就更加重了。妈妈来看的时候，就问她：“淑英，你怎么样了？”女儿哭着说：“妈，你别问了，你赶快领我回去吧！你不领回去，下次你就见不到你的女儿了！”妈妈看出了，女儿在黄家会折磨死的，就含着眼泪，把女儿带回家去。

妈妈给何淑英治好病，又把她先后送到何家大媽、二媽家。但是何淑英的日子仍然不好过。吃不饱，穿不暖。她想着她已活了十岁了，全在别人家里过年，没有吃过一回饺子，也没有吃过一回肉。她常常背个柳条筐，到地里去捡柴禾，捡点粮食，挖些可吃的野草野菜。在地里捡粮食、挖野菜的人很多。其中有个张木匠的女人，就叫何淑英走在她

的身边。因为何淑英小时候，媽媽曾把何淑英交她养过一天，由于看见她太穷了，怕养不起，就又抱了回来，其实她倒是喜欢何淑英的，如今就把何淑英当成女儿。她知道何淑英常常饿着肚子，又不肯跟大家到地里赶饭，就向那些扛长活的說好话，她說：“大爷大叔，我这孩子沒吃的，多少给她吃一点吧！”她要来給何淑英吃，沒有吃饱，她又帶她到別人的地里去討。有时，实在一点也沒有討着吃，地里捡的粮又少，她就接何淑英到她家去吃一頓，尽管吃的是野菜煮的棒子粥，但却能尽她吃饱，她才真正感受到穷人对穷人的温暖。

后来，何淑英不願和本家族人住在一起，就回到自己的小土屋里，独立生活。原来有家姓史的穷人，住在她家土屋里，对何淑英也很好。史家女人也帶何淑英到地里去赶过饭。过年的时候，她叫何淑英在她家吃饺子。何淑英这才第一次尝到了北方人三十晚上过年的幸福，虽然饺子里没有什么肉，但总算过年吃了饺子了。何淑英到今天还感叹地說：“什么亲戚，什么本家，都是把你不当人，只有穷人才真是一家！”

解放了，终于見了青天。接着土地改革，何淑英一家人分了土地，哥哥又在城里学皮鞋手艺，并已滿师，能够挣钱了，一家生活不成問題，母亲何傅氏也回来了。何淑英便进妇女班学文化，考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又到东壩去进了一年初中。这是她从来没有想到的幸福。在农业上，她努力干活。貧农下中农有什么吃亏的地方，她总要站出来給他

們說話，打抱不平。在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何淑英被选为园田北队貧农下中农小組的組长，带头工作，积极参加斗争，得到貧农下中农会員的贊美。

今天，新中国的大地上，不知有多少的青年，像郭瑞和何淑英一样，经历了苦难的童年，饱尝了旧社会的殘酷压迫，终于得到了解放，建立了幸福的家庭，真叫我們兴奋，又叫我們喜悅。糟踏穷苦人的旧社会，永远打垮，再不会起来了，我們也不准許它再恢复起来。有誰要使旧社会复辟，他就是我們最大的敌人！

(艾 蕪 記)